中古自然經濟

全漢昇

第一章　緒論——（一）B. Hildebrand的經濟史分期說及其修正——（二）漢代貨幣經濟的發展——（三）中古自然經濟興起的原因　第二章　中古的實物貨幣——（一）概說——（二）漢末三國時代的實物貨幣——（三）晉代的實物貨幣——（四）北朝的實物貨幣——（五）南朝的實物貨幣——（六）隋代的實物貨幣——（七）唐代的實物貨幣——（八）從敦煌寫本中所見的實物貨幣——（九）總結　第三章　中古的實物租稅與徭役——（一）魏晉時代的實物租稅與徭役——（二）北朝的實物租稅與徭役——（三）南朝的實物租稅——（四）隋唐時代的實物租稅與徭役——（五）總結　第四章　中古的實物地租　第五章　中古的實物工資——（一）魏晉時代的實物工資——（二）北朝的實物工資——（三）南朝的實物工資——（四）隋代的實物工資——（五）唐代的實物工資——（六）從敦煌寫本中所見的實物工資——（七）總結　第六章　安史之亂前後自然經濟的衰落與貨幣經濟的興起——（一）概說——（二）實物貨幣的廢棄與金屬貨幣(錢)使用的發達——（三）貨幣租稅的徵收與雇役制度的萌芽——（四）貨幣地租的萌芽——(五)貨幣工資的盛行——(六)總結　第七章　結論

第一章　緒論

（一）B. Hildebrand 的經濟史分期說及其修正

自然經濟（Naturalwirtschaft, Natural economy），創始於德國歷史學派的權威 Bruno Hildebrand。他以交換爲標準來作經濟史的分期，主張人類經濟發展的歷史分爲第三個次第相續的階段：（1）自然經濟時代——這是物與物相交換的時代。(2) 貨幣經濟(Geldwirtschaft, Money economy)時代——這時金屬貨幣用作交易媒介。(3) 信用經濟(Kreditwirtschaft, Credit economy) 時代——這時最後以同一物或等價物清算，而先由信用進行貨物的交換（註一）。我們在這裏要注意的，是自然經濟時代的情形。在自然經濟時代，既然沒有金屬貨幣的使用，人們在

(註一)B. Hildebrand, Jahrbuecher fuer Nationaloekonomie und Statistik, vol. ii, 1864, pp.1—24

買賣方面只好用實物來作交易的媒介，在勞動方面用實物來作工資的報酬，此外賦稅的征收，與地租的繳納，也以實物爲主（註二）。

上述經濟史分期的主張，在德國學術界中影響甚大，但在德國以外其他國家的學者看來，却是一種很受攻擊的學說。茲舉三人爲例。頭一位是比利時經濟史學者 Henri Pirenne, 他說：

> 把商業發展分爲三個次第相續的階段——最先一個的特色爲物物交換（自然經濟），其次爲貨幣（貨幣經濟），最後爲信用（信用經濟）——的學說，流行甚久。但一察事實，牠實在沒有確切的根據，只是那種常常影響于經濟史研究的爽系統化的學說的另一例子而已。雖然信用日益重要，是無可駁議的，但牠在各時代都發生過作用，也是同樣眞確的。其間的差異，只是量的不同，幷非質的差別（註三）。

其次一位是英國劍橋大學的經濟史學者 J. H. Clapham，他說：

> B. Hildebrand 的學說，假定自然經濟，貨幣經濟及信用經濟三個階段次第相續。這一說應用於歷史上的弊病就是：把某一時期叫作自然經濟時期，便很容易忽略了同時並存的別種經濟樣式的證據。比方說，爲要證明北歐中古初期不是純粹的自然經濟時期，已經費了長期的研究與爭論。而且，自然經濟一詞，可以包羅極端簡單的和極端複雜的經濟制度。古代埃及文化中的那種『交換』，比起不使用貨幣的原始日耳曼或近代原始社會的那種『交換』，很少相似的地方。而且，除却史前期及最早的歷史期以外，使用貨幣與不使用貨幣的社會往往同時並存。自然經濟的遺跡，在使用貨幣的社會裏，無論是過去或現在都看得見。某種形式的信用在多數文化的早期也多少已經有了，却從未在任何時期佔絕對支配地位。因此，要想把某一時期的某一社會規定爲某一階段，在事實上程度上都是一個繁難的問題，不大值得探討（註四）

最後一位是英國經濟學者 Norman Angell，他說：

(註二)參考 Werner Sombart 著季子譯現代資本主義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七六至七八頁。
(註三)Henri 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pp. 118—119。
(註四)Edwin R. A. Seligman (ed), 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 vol. VII, p. 349。

爲便於了解貨幣之功能計，我人又不妨想像有數歷史學者，對於社會所描繪之圖畫：卽人類之進化，最先則起自半動物之無交易狀態，再由此種無交易之游牧羣，進至行使物物交換之部落；再由是而進於貨幣經濟；再由是而進於信用經濟。此種敍述，頗能助人之理解；唯以敍述過於明析簡單，故於事實上未免不甚相符。蓋歷史進行之程序，並不若是之整齊。換言之，貨幣之爲物，遠在歷史以前卽有之，而信用要素之發生，爲時亦甚早；第以人類發見貨幣之後，未必卽行採用；或則雖經採用之後，重復予以廢棄；而廢棄之後；亦並無大害於社會之生活；故貨幣之出現，爲時未必晚，特其發揮功能則在于後世耳。總之，自物物交換以進于貨幣經濟時代，決非一時代完了之後，另一時代卽繼之而起，此種斬釘截鐵之明晰發展，歷史上實無其例（註五）。

這幾位批評者和 Hildebrand 的爭點，可以說是絕對說與相對說的不同。如果從絕對的觀點來看，那末，人類經濟發達的歷史當然不能那樣斬釘截鐵般的劃分清楚。但如果從相對的觀點出發，話可不是這樣說了。在某一社會裏，同時雖有物物交換，貨幣及信用三者的存在，但牠們絕不會勢均力敵，在同一期間內較佔優勢的往往只有一個。這一點，上述幾位批評者也是承認的。因此，我們可以從這三者比重的大小來判別某時期的社會應屬于那一階段。這可以說是對 Hildebrand 學說的修正。從這個觀點出發，作者認爲自漢末以後，至安史之亂的前後，卽約由公元二世紀末至八世紀中葉，自然經濟在中國社會裏較佔優勢——雖然南朝的錢幣勢力相當雄厚，但仍不能取自然經濟的地位而代之。

現在就材料排比的方便，擬從下列數點來探討中古時代中國各地自然經濟發展的情形。卽：自公元二世紀末至八世紀中葉，當錢幣沒有流通，或流通量比較稀少的時候，人們怎麼樣去做他們的買賣？怎麼樣向政府盡納稅的義務？租借田地時，農人對地主繳納些什麼作爲地租？爲人作工時，勞動者從僱主處領到些什麼作爲工資的報酬？不過，在說明這幾個問題以前，我們先要探討中古以前貨幣經濟發展的情形，及中古時代自然經濟發展的原因。

（註五）Norman Angell 著何子恆譯貨幣的故事第一九至二〇頁。

（二）漢代貨幣經濟的發展

自周景王二一年（525—524 B. C.）鑄大錢（註六）後，錢幣在中國社會內已漸漸流通。到了漢代，錢幣的使用更爲發達。除買賣時用作交易媒介外，當日官吏俸祿的一部份，以錢支付（註七）。在賦稅方面，幼年人年出二十三文的口錢（註八），及成年人年出百二十文的算賦（註九），均以錢繳納。漢桓帝對于郡國的田地，課以每畝十錢的租稅（註一〇）。至于徭役的提供，也可用錢來代替。例如，人民每年須戍邊三日，不往者可出錢三百文來免役，稱爲過更；每年須在政府服役一月，不服役者可出錢二千文來代替，稱爲踐更（註一一）。

可是，我們對于周景王鑄大錢後的錢幣流通情形，不能過于誇大。因爲自此以後，錢幣雖然流通，在好些地方，人民仍舊用實物作交易工具來買賣。孟子記載楚人許行以粟易褐布、素冠、釜、甑及鐵器（註一二）。可見戰國時代楚國還有物物交換的事實。到了漢代，貨幣經濟雖然已經抬頭，但牠的發展程度究竟有限。所以『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直至後漢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41A. D.），始行五銖錢（註一三）。官俸的一半，雖用錢支付，但其餘一半，還須以穀發放（註一四）。至于田租（按卽田賦），除上述每畝十錢的租稅外，亦均以穀繳納（註一五）。

（三）中古自然經濟發展的原因

漢代貨幣經濟的發展，從漢末以後，大受打擊。從此以後，自然經濟漸漸佔有勢力，貨幣經濟則一天比一天的衰落下去。這裏我們要問：從漢末以後，中國社會爲什麼會由貨幣經濟逆轉爲自然經濟？

（註六）國語卷三周語下。

（註七）漢書卷七二貢禹傳，後漢書卷三八百官志。

（註八）漢書卷八昭帝紀如淳注。

（註九）漢書卷二惠帝紀應邵注。

（註一〇）後漢書卷七桓帝紀。

（註一一）漢書卷八昭帝紀如淳注。

（註一二）孟子滕文公上。

（註一三）後漢書卷一下光武紀。

（註一四）後漢書卷三八百官志。

（註一五）漢書卷七二貢禹傳。

漢末以後自然經濟代貨幣經濟而起的第一個原因是戰爭(註一六)。中國自漢末以後，社會上發生很大的騷動。如三國時各地軍事領袖的混戰，和西晉八王之亂，都足以擾亂當日社會的安甯。不過規模最大，影響最烈的戰爭，當然要推漢末的黃巾暴動，與董卓之亂，和西晉末葉的五胡亂華。戰亂的區域非常廣大，以黃河流域作中心，江、淮、荆、蜀都曾波及。

現在我們首先要說明的，是戰爭與商業發展的關係；其次要說明商業盛衰與自然經濟和貨幣經濟的關係。

上述漢末以後的戰爭，給漢代相當繁榮的商業(註一七)以很嚴重的打擊。商業中心的城市，經過大規模的戰亂以後，破壞得非常利害。三國志吳志卷一一朱治傳注引江表傳云：

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

例如『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牆間。……飢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採，或飢死牆壁間』(註一八)。又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註一九)。這都是漢末三國初年的情形。及五胡入侵，城市的破壞更爲利害。晉書卷五六孫楚傳附綽傳云：

胡戎交侵，……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

這時候的洛陽，簡直變爲廢墟。晉書卷一〇三劉曜載記說：

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

又吳士鑑晉書斠注卷一四上地理志引華延雋洛陽記云：

自劉曜入洛，元帝渡江，官署里閭，鞠爲茂草。

至于長安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晉書卷五孝愍帝紀云：

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頹毀，蒿棘成林。

(註一六)此點前人已經指出。見下引晉書卷二六食貨志載東晉孔琳之的話。

(註一七)關于漢代商業的繁榮，記述頗多。茲引王符潛夫論卷三浮侈，以見一斑：『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塡塞道路。游手爲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于農夫，……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

(註一八)三國志魏志卷六董卓傳。晉書卷二六食貨志略同。

(註一九)後漢書卷一〇二董卓傳。

漢末以後的戰爭，除對商業中心的城市作直接的毀壞外，又產生三種現象，影響到商業的衰落。頭一種現象是人口的銳減。戰時的人口，一方面直接受兵災的蹂躪，他方面又飽嘗戰爭引起的飢荒與疾疫，數量當然要大爲減少。因此，『自(李)傕（郭）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註二〇)。這雖然只是關中一帶人口極端稀少的景象，但其他地方也逃不了人口稀少的命運。在三國時，『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註二一)。其次一種現象是土地的荒蕪。在戰亂中，原來從事生產的人口，多半加入流亡隊伍中到處轉動，土地的荒蕪是不能避免的。上引吳志註江表傳曾說，『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道殣相望』。又晉書卷一四地理志也說：

> 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靈版蕩，關洛荒蕪。

這兩種現象，到了西晉末葉，更爲嚴重。五胡亂華的結果，人口更加稀少，土地更加荒蕪。關于此事，晉書記載至多：

> 至于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幷、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姓又爲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飢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卷二六食貨志）
>
> 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卷五六孫楚傳附綽傳）
>
> 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寒流隕，相繼溝壑。（卷一一九慕容皝載記）

此外，當日又產生第三種現象，即交通的困難。如晉書卷一一四苻堅載記說：

> （慕容）冲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

當日戰後人口既然銳減，其消費量自然跟着減少，從而對市場上商品的需要自亦大減。復次，土地既然荒蕪，其生產量自然大爲減少，從而市場上商品的供給自亦銳

(註二〇)後漢書卷一〇二董卓傳。

(註二一)魏志卷一六杜畿傳。

減。這種商品供給的銳減，再加上交通困難一因素，情形尤爲嚴重。市場上一般商品的供給與需要既然全都大爲減少，交易量自然跟着激劇的減少。這樣一來，商業能夠避免衰落的命運嗎？

商業的盛衰，給貨幣使用的進步與退化以很密切的影響。在古代，人們欲望較小，其交換的目的在取得自己的消費物品，對於貨幣需要不大。這時交易的過程是：

C——M——C（註二二）

卽。

貨物（自己所餘）——貨幣——貨物（自己所需）

可見這時交易者（消費者）的目的，在取得自己需要的貨物來滿足個人的欲望；至于貨幣，并不是他們交易的目的物，只是取得自己需要的貨物的手段而已。其後，人類欲望漸大，交易較前頻繁，專業的商人遂代替以前的消費者來從事買賣，從而對于貨幣的需要大增。這時交易的過程是：

M——C——M（註二三）

卽：

貨幣（自己資本）——貨物——貨幣（含有利潤）

可見這時交易者（商人）的目的，在獲得含有利潤的貨幣，而不在貨物；這時貨物的購買只是獲得貨幣的手段而已。總之，當交易簡單的時候，人們多半注重貨物；及交易頻繁的時候，人們則轉而注重貨幣。由此可知，商業的發展與衰落，足以影響到貨幣使用的進步與退化。如上所述，漢末以後商業既因屢受戰爭的影響而大爲衰落，貨幣的使用自然亦要跟着退步了。因此，錢幣的使用在漢代雖然已經相當發達，從漢末以後却宣告停滯。關于此點，前人也曾經討論過。晉書卷二六食貨志載安帝元興中孔琳之說：

錢之不用，由于兵亂，積久自至于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註二四）。

錢幣的廢棄，給實物貨幣以流通的機會。這樣一來，自然經濟遂代貨幣經濟而起。

（註二二）Karl Marx, Capital(Every Man's Library), vol. I, p. 83。

（註二三）ibid, vol. I, p, 132.

（註二四）宋書卷五六孔琳之傳同。

漢末以後，貨幣經濟逆轉爲自然經濟的第二個原因，是鑄造錢幣所用的銅的減少。當日銅的供給所以減少，一方面由于銅鑛產量的銳減，他方面由于佛寺之大量的用銅鑄像。

在漢代，銅鑛的產量相當的大；吳王濞對于豫章郡的銅山，鄧通對于四川嚴道的銅山，都曾作過大規模的開採(註二五)。但這些銅鑛的產額，自漢末以後，卽作激劇的減少(註二六)。因此，吳孫權的鑄錢，不如吳王濞那樣採銅于豫章銅山，只收羅民間的銅來鑄(註二七)。蜀劉備也不學鄧通那樣採銅于嚴道銅山，而『取帳鈎銅鑄錢』(註二八)。往後到了劉宋元嘉二年（425）四月，沈演之還說錢少由于『採鑄久廢』(註二九)。再往後，到了南齊武帝永明八年(490—1)，政府雖曾開採蒙山（在今四川雅安名山蘆山三縣界）的銅鑛，但鑄錢千餘萬文以後，卒因『功費多，乃止』(註三〇)。

復次，自佛教輸入中國後，在各地普遍設立的佛寺，多以大量的銅來製造佛像。這種風氣在漢末三國初已經相當盛行。丹陽人笮融在彭城（卽徐州）一帶『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註三一)，便是其中顯著的例子。其後，由于佛教大師佛圖騰（或作佛圖澄）鳩摩羅什等的來華，二石姚興等統治者的信佛，佛教勢力遂日益雄厚，從而佛寺用銅鑄像的事亦大大增多。佛寺的數量，在

(註二五)漢書卷三五吳王濞傳，卷九三鄧通傳。王先謙漢書補註以爲『豫章郡』應作鄣郡，卽丹陽郡。參考漢書補註卷三五。

(註二六)當日銅礦產量減少的原因，史無明文。據作者推測，約有兩種可能的原因：(1)由于戰爭對于銅礦生產的破壞；(2)由于礦業本身的理由。前一點甚爲明顯，後一點則須略爲說明。原來礦業是受成本遞增或報酬遞減原則支配的一種實業，優良的礦脈開採完了，較劣的礦脈也得採掘；同時，如果越掘越深，則離地面越遠，其產品的運費越要增加。因此，在漢代曾經大規模開採的銅礦，自漢末以後，很可能的因爲遞增的開採成本之所失，遠不如遞減的銅礦產量之所得，其開採只好停工，從而銅礦產量遂大減。

(註二七)吳志卷二吳主權傳嘉禾五年條。

(註二八)南齊書卷二八崔祖思傳。

(註二九)宋書卷六六何尙之傳。

(註三〇)南齊書卷三七劉悛傳。

(註三一)吳志卷四劉繇傳。

北朝光是洛陽便有一千餘所(註三二)，全國則有三萬餘所(註三三)；在南朝梁武帝時，光是建業一城，也有五百餘所(註三四)。佛寺中銅像的數量，如徐州城中五級寺，多至一百軀(註三五)。至于鑄造每一佛像所用的銅，數量也很驚人。在北朝，魏興光元年(454)秋，政府在五級大寺內爲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共用銅一萬五千斤，卽每一像用銅五千斤。這還算是比較小的。皇興元年(467—8)，政府又于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丈，用銅十萬斤(註三六)。在南朝，釋道安于襄陽檀溪寺造一佛像，用銅一萬斤以上(註三七)。梁天監八年(509—510)，彭城宋王寺造一丈九金像，用銅四萬三千斤(註三八)。如果把當日全國各地佛寺鑄像用銅的數量總算一下，其用銅之多，一定非常驚人！這許多佛寺的銅像既然消耗了大量的銅，無怪當日能夠用來鑄錢的銅要大爲減少了。這種情形，當社會經濟的發展還沒有進步到非使用錢幣不可的時候還可忍受，但一到商業發展，錢幣的需要大增的時候，人們望着佛寺的銅像可要眼紅起來了。所以唐武宗的毀法，固然有其宗教上的動機，但取銅像的銅來鑄錢無疑的也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註三九)。

總之，自漢末以後，能用來鑄錢的銅，一方面由于銅鑛產額的銳減，他方面由于佛寺對銅的大量消耗，供給量大爲減少。這樣一來，當日錢幣的鑄造額自然跟着作激劇的減少。因此，自後漢初平元年(190)六月董卓壞五銖錢改鑄小錢(註四〇)以後，中間除却吳孫權于嘉禾五年(236)春鑄當五百大錢，赤烏元年(238)春鑄當千大錢(註四一)，及蜀劉備于建安二十三年(218—9)左右鑄直百錢(註四二)外，直到宋元

(註三二)後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序例。

(註三三)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

(註三四)南史卷七〇郭祖深傳。

(註三五)北齊書卷四六蘇瓊傳。

(註三六)均見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

(註三七)梁慧皎高僧傳卷三道安傳。

(註三八)同書卷一三釋法悅傳。

(註三九)參考第六章第一節。

(註四〇)見第二章第二節。

(註四一)吳志卷二吳主權傳。

(註四二)三國志蜀志卷九劉巴傳註引零陵先賢傳。

嘉七年(430)十月，及北魏太和十九年(495—6)，始再有鑄錢的史實(註四三)。錢幣的鑄造額既少，其流通量自然不多。這樣一來，遂給實物貨幣以流通的機會，故自然經濟遂代貨幣經濟而起。

第二章　中古的實物貨幣

(一)概說

無論那個社會，其最原始的交易都脫離不了物物交換的狀態。不過所謂物物交換，也不是任何時候都是一樣的。在最初的時候，各人只是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其中並沒有交易媒介的發生。可是這種物物交換的辦法，到了交易稍爲複雜的時候，事實上是行不通的。購買者拿出來和人家交換的物品，也許是對方所不要的。爲着要免除這種現象，人們不得不先交換容易出賣的物品，卽各人都需要而願意接受的物品，然後再將這些物品去交換自己需要的貨物。交換的時候，將這種容易出賣的物品與別種貨物相比較，以確定後者的價格(註四四)。這種容易出賣的物品遂成爲具有交易媒介和價值單位兩種機能的貨幣。例如，在牧畜時代，牲畜一方面以肉供人食用，他方面又能爲人馱運貨物，成爲人們最需要而願意接受的物品，在市場上遂具有交易媒介和價值單位兩種機能，從而成爲當日的貨幣。拉丁語『Pecunia』(貨幣)的語源爲 Pecus，而 Pecus 是牲畜之意。英語的『Fee』，源于 Goth 語 Failu，後者也是牲畜之意。印度的『Rupee』，源于梵文 Rupya，而後者也是得自解釋爲牲畜的字(註四五)。在這些用作貨幣的牲畜中，牛更是最重要的一種。牠在亞利安各種族中是最普遍使用的價值單位。在荷馬詩中，物品的價值常常用牛來表示。如 Diomed 的武器值九條牛，Glaucos 的則值一百條牛。一個以工藝見長的女奴價格爲四條牛。一個三脚盆的價格爲十二條牛(註四六)。

中古時代的中國，已經不是牧畜社會，故沒有上述以牲畜作貨幣的事實：但以

(註四三)宋書卷五文帝紀，鏡書券一食一〇食貨志。

(註四四)庫斯聶著高素明譯社會形式發展史大綱下卷第四二頁。

(註四五) A. R. Burns,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Early Times, P, lo,

(註四六) ibid pp, 6—8.

其他物品作爲貨幣來交易，却不可勝數。當日中國人民的產業多以農業及家庭工業爲主，其生活上最需要的物品是作食料用的穀麥，和作衣料用的布帛。因此，這些東西成爲市場上人們願意接受的物品；當錢幣稀少或不流通的時候，牠們便取錢幣的地位而代之。

（二）漢末三國時代的實物貨幣

漢獻帝初平元年（190）六月，董卓壞五銖錢，改鑄小錢，自此後錢幣便惡劣而不行用。魏志卷六董卓傳說董卓

> 悉椎破銅人鍾虡，及壞五銖錢，更鑄爲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註四七)。

這是中古時代中國各地廢錢用穀帛來交易的開始。通典卷八曾引東晉孔琳之的議論，說約由魏明帝時上溯四十年，穀帛卽已代錢作貨幣來行用：

> (晉)安帝元興中，……孔琳之議曰，『……錢之不用，由于兵亂，積久自致于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魏明帝時，錢廢用穀，四十年矣(註四八)。以不便于人，……彼尙捨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于已試也。……』

按魏明帝之復行五銖錢，事在太和元年（227）四月(註四九)。由此上溯四十年，約比初平元年早兩三年。所謂『四十年』，不過是一個大約的數目而已；但和宋書孔琳之傳的『三十季』比較起來，却近似一點。由此可知，漢末自初平元年錢貨不行以後，穀帛卽在市場上被用作貨幣，具備了交易工具和價值單位（或價值標準）兩種機能。其中關于布帛的被用作貨幣，又可以下列一事來作證明。魏志卷二七王昶傳注引任嘏別傳說任嘏少時與人各以布帛八匹共買生口，其後生口價格竟上漲至六十匹云：

> （任）嘏，樂安博昌人。……八歲喪母，……年十四始學。……遂遇荒亂，家貧，賣魚。……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

(註四七)後漢書卷一〇二董卓傳略同。同書卷九獻帝紀系此事于初平元年六月條。

(註四八)宋書卷五六孔琳之傳作『三十季矣』。晉書卷二六食貨志作『旣久』。

(註四九)魏志卷三明帝紀。

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嘏應其舉，爲臨菑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

自漢初平元年錢幣停止行用後，過了三十一年，到魏文帝黃初二年（221）三月，政府曾一度恢復五銖錢的行使。但行使的時間不過半年多點，到了同年十月，又明令停止五銖錢的行用（註五〇）。錢幣既被廢棄不用，穀帛等實物遂以貨幣的資格流通于市場上。晉書卷二六食貨志說：

又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註五一）。

又通典卷八云：

魏文帝穀帛相貿。

又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引魏文帝詔說當日曹魏的坐賈常壓低客商運來的貨物的價格，然後以絹收買云：

今與孫驃騎和（註五二），通商旅，當日月而至。而百賈偸利，喜賤其物，平價，又與其絹。故官逆爲平準耳。官豈少此物輩耶？

這種廢錢用穀帛來交易的情形，時間久了，流弊便要發生，有如晉書卷二六食貨志所說：

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

安帝元興中，……孔琳之議曰，『……穀帛爲寶，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于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註五三）

因此，到了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四月，由于司馬芝等人的提議，政府遂下令恢復

（註五〇）魏志卷二文帝紀。

（註五一）通典卷八略同。

（註五二）孫驃騎當即指孫權而言。他與魏曹丕的通知，事在吳黃武元年，即魏黃初三年（222），九月。

（註五三）通典卷八略全。

五銖錢的行用(註五四)。

不過，曹魏自太和元年起雖然已經復行五銖錢，但因錢的流通數量甚少，實物仍以貨幣的資格流通于市面上。如魏志卷九夏侯尚傳附玄傳注引魏略說景初年間(237—9)人們可以布帛買官云：

> 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爲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爲護軍時(註五五)，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聞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

又魏志卷二七胡質傳注引晉陽秋說胡質以絹一匹給其子威，以作旅途上購買粮食之用云：

> 胡威字伯虎，……質之爲荆州也，威自京都省之。……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匹，爲道路粮。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于何得此絹？』質曰，『是故俸之餘，故以爲汝粮耳。』(註五六)

又漢武帝內傳（漢魏叢書本）說以錢及布購買玉箱玉杖云：

> 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于扶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認以告有司。詰之。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宿鄜（太平御覽卷八二八引漢武內傳及守山閣叢書本均作「鄜」）市，其日見一人于此（守山閣叢書及墨海金壺本均作「北」）車巷中賣此二物，青（御覽作「責」）布三十疋，錢九萬，卽售之，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姓名。事實如此。有司以聞。商人放還。詔以二物付太廟。

這裏我們要探討的，是這種以布及錢買物的現象到底發生于什麼時候？漢武帝內傳雖說以錢布買箱杖事發生于武帝死後不久，但此書作者既非班固，而是魏晉間的文

(註五四)魏志卷三明帝紀，晉書卷二六食貨志，通典卷八。

(註五五)蔣濟于魏明帝景初年間爲護軍，見魏志卷一四本傳。

(註五六)晉書卷九〇胡威傳，及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引晉陽秋略同。

士(註五七)，則後者于作此書時，把當日以布帛購物的現象參雜入內，甚有可能。故作者認這段記載可看作魏末晉初以布帛作交易媒介的旁證。

三國時代，除曹魏外，孫吳境內的買賣也多以穀帛作貨幣。固然，如上述，孫權曾于嘉禾元年(236)春鑄當五百大錢，赤烏元年(238)春鑄當千大錢。但當日銅的供給既少(註五八)，錢的成色一定很低；反之，錢的面值却大到當五百文及當千文。這種成色與面值相差太遠的大錢，當在市場上流通的時候，并沒有得到人民的歡迎。因此，大錢行用不久，政府便于赤烏九年(426—7)下令收回，把牠們改鑄爲器物(註五九)。當日孫吳境內錢幣的流通額既然很少，人們在買賣時遂多以穀帛作貨幣。如吳志卷三孫休傳注引襄陽記說李衡大種甘橘，其後人將產品出賣，每歲得絹數千匹云：

> (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龍陽(在今湖南常德縣)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註六〇)。

又晉書卷三四羊祜傳說羊祜在吳境行軍時，以絹支付穀價云：

> 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粮，皆計所侵，送絹償之。

又太平御覽卷八三七引羊祜別傳亦記此事云：

> 祜周行賊境七百餘里，往反四十餘日，刈賊穀以爲軍糧，皆計頃畝送絹還直，使如穀價。

這都是以布帛作爲交易媒介的例子。復次，當日布帛又是價值的標準，有以布帛的多少來表示物品的價值的。如吳志卷三孫皓傳注引江表傳說一隻好狗的價格貴至布帛數千匹云：

(註五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二云，『漢武帝內傳一卷，舊本題漢班固撰。隋志著錄二卷，不註撰人。宋志亦註曰「不知作者。」此本題曰班固，不知何據？……其不出于固，灼然無疑。……其殆魏晉間文士所爲乎？』

(註五八)第一章第三節曾說孫吳的鑄錢，并沒有大規模的開礦取銅，只收羅民間的銅來鑄。

(註五九)吳志卷二吳主權傳注引江表傳，晉書卷二六食貨志。

(註六〇)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序及太平御覽卷九六六引襄陽記略同。

（何）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

以上都是孫吳境內以布帛作貨幣來交易的例子。此外，當日南方各地，尤其是閩粵一帶，又有以穀米作交易媒介的。如晉葛洪神仙傳卷六說董奉賣杏，收穀作代價云：

> 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吳先主時，……奉居山……栽杏……十萬餘株，鬱然成林。……後杏子大熟，于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卽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來少，而取杏去多者，……急挈杏走，路傍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奉每年貨杏得穀，……歲二萬餘斛(註六一)。

又晉書卷五七陶璜傳說合浦郡百姓賣珠，取米作代價云：

> 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採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飢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

至于當日南方文化低下的俚人，在買賣時尚保持着純粹的物物交換的狀態，其中幷沒有使用交易的媒介。如太平御覽卷四九二引南州異物志(註六二)說：

> 俚人不愛骨肉，而貪寶貨。見賈人財物牛犢，便以子易之。

除魏及吳外，三國時代的蜀也有以實物作貨幣來交易的事情。如晉常璩華陽國志（漢魏叢書本）卷一一後賢志說何隨于蜀亡時以帛或緜支付芋價云：

> 何隨字季業，……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飢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芋。隨以緜（太平御覽卷九七五引作「帛」）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緜，相語曰，『聞何安漢淸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緜追還之。終不受。因爲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爲之償。』(註六三)

(註六一)按神仙傳爲晉葛洪所撰，上距三國不遠，且神仙傳中記董奉爲士燮醫疾事，又爲吳志卷四士燮傳注所引，理當可信。

(註六二)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云，『南州異物志一卷，吳丹陽太守萬震撰。』

(註六三)太平御覽卷九七五略同。

（三）晉代的實物貨幣

三國以後，便是晉代。三國時代錢幣流通稀少的情形，到了晉代并沒有多大的改變(註六四)。因此，在市場上買賣時，人們仍多使用實物貨幣來交易。如晉書卷二六食貨志說政府以布帛買穀云：

> 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

又太平御覽卷五九八引石崇奴券說石崇以絹百匹購買奴隸云：

> 余元康之際(291—300)，至在滎陽東住，聞主人公言聲高大，須叟出趣吾車曰，『公府當怪吾家曉曉邪？中買得一惡羝奴，名宜勤，身長九尺餘，力舉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錢孔，言讀書，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問，『公賣不？』公喜。便下絹百匹。……乃歛吾絹而歸。

又同書卷四八六引孔舒元在窮記說孔衍賣壞車得絹，復以絹糴米及買橡實云：

> 遣信與義陽太守孫仲開相聞，告其困乏。得絹二疋，壞車一乘。賣得絹三疋。以糴，得米一石，橡三斛。食口三十五人，百日之中，以此自活。人皆鶴節，無復血色(註六五)。

這都是西晉時代國內各地使用布帛作交易媒介的情形。復次，西北邊境的河西，卽後來前涼的轄境，從晉武帝泰始年間(265—275)起，直至愍帝初年(313)，更是完全廢棄錢幣，而以縑布作貨幣來交易。晉書卷八六張軌傳云：

> 愍帝卽位，……大府參軍索輔言于軌曰，『……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布旣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

(註六四)晉書卷九四魯褒傳載有魯褒的錢神論，描寫晉代某些人愛重錢幣的情形，甚至說錢可通神使鬼。這似乎是當日錢幣流通發達的表示，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在晉代史籍中，我們找不到政府鑄錢的記載，其流通量自不會多。當時人們所以愛重錢幣，想是因爲錢幣流通稀少，從而錢幣價值增大所致。

(註六五)晉書卷九一孔衍傳云，『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以太興三年(320—1)卒于官，年五十三。』孔衍旣卒於東晉初年，則此事當發生于西晉時無疑。

以上都是西晉時代布帛被用作交易媒介的情形。其次，布帛又是當日價值的單位，即物品的價值多以布帛的匹數來表示。如晉書卷三〇刑法志說以布帛匹數表示贓物的價值云：

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贓五匹以上，棄市。

西晉末葉，五胡入侵，商業因受戰亂影響而更加衰落。結果，錢幣的使用更少，布帛在流通界中更有勢力。如晉書卷一〇五石勒載記說後趙石勒令公私行錢，結果大大失敗云：

其時（晉元帝太興二年，319—320）兵亂之後，典度堙滅。……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干，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于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而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于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

又說當日財產的價值多以布帛匹數表示云：

勒曰，『……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

又後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一〇引燕書說前燕慕容評出賣泉水，收絹作代價云：

（評）障固山泉，鬻水與軍，入絹匹水二石。

又太平御覽卷三三四引崔鴻十六國春秋亦說他賣柴與水，得錢絹甚多云：

評性貪鄙，障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

以上是五胡亂華後北方市場上把布帛當作貨幣來使用的情形。至於當日的南方，當晉室衣冠南渡，元帝偏安江左（317）的時候，仍舊是孫吳以來錢幣流通稀少的狀態。宋書卷六六何尚之傳云：

中領軍沈演之以爲『……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

當日東晉境內錢幣的流通既然不甚普遍，一時要使錢普遍流通于各地是一件很繁難的事。桓玄看到了這一點，故在安帝元興中（402—5）輔政的時候，索性提議完全廢棄錢幣，而以穀帛代替來交易。這件事後來雖然因爲孔琳之等的抗議而沒有實

行(註六六)，但由此亦可看出當日錢幣勢力的微弱，和實物貨幣在流通界中的優勢了。因此，翟湯把干寶送給他的船出賣的時候，他取得的代價是絹物，不是錢幣(註六七)。劉超從政府那裏買一條牛，他所付的牛價，除了錢三萬文外，還有布五疋。太平御覽卷八二八記此事云：

> 劉超讓表曰，『臣家理應用一純色牛。連市素不如意。外厩猥牛中牛色，有任用者。臣有正陌三萬錢，五疋布。乞以此買牛。』詔曰，『監此不足賣與，宜便賜之。然義與前後辭讓，不妄受一賜。今亦必復不受。可聽如所啓。』(註六八)

當日的布帛，除如上述用作交易的媒介外，同時又具有價值單位的機能。如晉書卷七五范汪傳附堅傳說官幔的價值以布的匹數表示云：

> (成帝)時(326—342)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請正刑棄市。

又宋書卷五四羊玄保傳說以布帛的長短計算山宅的價值云：

> 有司檢(晉成帝咸康二年，336—7)壬辰詔書：占山護宅，彊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

上述晉代布帛被用作貨幣來交易的情形，多採自書本上的記載。復次，我們又可根據近世 Stein 及 Sven Hedin 等在羅布淖爾(又名蒲昌海)附近，即樓蘭一帶，發見的晉代木簡，來探討當日西北市面上把布帛當作貨幣來使用的情形。作者現要舉出的幾塊木簡中，有一塊記有晉武帝泰始年月，其爲西晉時物，當然沒有問題。至于其餘各簡，雖不明載年月，但經過王國維氏的考訂(註六九)，大家也公認爲晉代的物品了。現在先舉出記有年號的木簡于下；這是 Sven Hedin 在樓蘭發見的，內有以綾綵羅穀的記事：

> 敦煌短綾綵廿匹・給吏宋政羅穀。(簡之上部)

(註六六)晉書卷二六食貨志，宋書卷五六孔琳之傳，通典卷八。

(註六七)晉書卷九四翟湯傳。事在晉元帝時(317—322)。參考晉書卷八二干寶傳。

(註六八)事在晉明帝時(322—5)，見晉書卷七〇劉超傳，但後者記此事甚簡略。

(註六九)王國維流沙墜簡序，『案古簡所出，爲地凡三。……二爲羅布淖爾北之古城。……出羅布淖爾北者則自魏末以訖前涼。』

泰始五年十一月五日，從掾位馬厲，主者王貞，從掾位趙辯，付從史位宋政。（簡之下部）(註七〇)

Sven Hedin 在樓蘭發見的另一木簡，則記有以布購買奴隸的事：

計沃芷一口，少百七十八匹八尺八寸六分；王芷一口，償布百六十(註七一)。

至於 Stein 發見的晉簡，則見于下列兩書。王國維流沙墜簡卷二屯戍叢殘考釋簿書類三十二說以綵羅縠云：

以羅縠，貸藏(註七二)見綵羅縠。載(註七二)貸綵十八匹。謹案文書。

又同書卷二屯戍叢殘考釋器物類六三說以綵三匹購買青旂一領及故黃旂褶一領云：

兵胡月甯市青旂一領，廣四尺六寸，（簡面）

長丈一尺，故黃旂褶一領，賈綵三匹。（簡背）(註七三)

又同書卷二器物類六四說某物的價格以綵的匹數來表示云：

上缺正賈長度綵二匹 短度十四匹寄藏。

又張鳳漢晉西陲木簡彙編第二編左朗簡說以綵購買瓜菜云：

水曹掾左朗白：前府掾所食儲部瓜菜賈（價）綵一匹，付客曹。

Sven Hedin 在樓蘭發見的古物，除晉簡外，又有不少的用紙寫的文件(Documete auf papier)。在這些文件的記載中，我們也可以看見晉人把綵當作貨幣來使用的情形。如下引的文件說某人借去大麥，規定以綵還給麥主，作爲麥價云：

□□□□□□□平安□□

(註七〇)August Conrady, 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 in Lou-lan, p, 134.

(註七一)ibid, p. 121.

(註七二)王國維氏不識此二字，茲從同事勞貞一先生說，加以改正。

(註七三)王國維氏解釋此簡云，「右簡旂者，旜之假借字。褶，衣之有表裏者也。綵者帛之一種。後漢時或言縑綵（後漢書西羌傳）或言綵繒，或言綵帛（均南匈奴傳），知綵乃帛名。賈綵三疋者，謂以綵三疋易旂二領也。綵者漢物，旂者胡物，蓋當時諸國間全以貨物相貿易矣。」按以綵易旂事不一定是國與國間的貿易，因爲當日布帛就是貨幣，而綵是布帛的一種，以綵支付物價本是常事。如上述的以綵羅米，下述的以綵買瓜菜，我們能夠一定說綵是漢物，米及瓜菜是胡物嗎？

君客至得書音，口問消（息）。

知其無爲欣然及(註七四)前穀者。

仁君客來(註七四)，輒以大麥一斛斗

付之。□□□以爲慚愧。今者

當還。□□□須待嗟回調穀

□□□□（月）末記當發。此正

□□□□□愛(註七四)重往來復

□□□□□□令狐輿稟（以上紙面）

□□□□□□死罪(註七四)當還

□□□□□□來曹家雄

□□□□□□未肯時還。今

□□□□□郡，無欲還綵意。

在遠□□□自濟。今欲案留

霸一生口。□聞承，死罪死罪！（以上紙背）(註七五)

又如下引文件說以綾綵匹數表示穀食與胡牛的價格云：

從史位宋政白：謹條督(註七六)武翊於（下闕）

物。穀食與胡牛賈綾綵匹數（下闕）

九月二十日。(註七七)

以上都是晉人在買賣時把布帛當作貨幣來使用的情形。不過在當日市場上具有貨幣機能的實物，如三國時那樣，不限於布帛，穀粟等農產品也包括在內。如晉書卷二六食貨志說政府賣牛，收穀作代價云：

杜預上疏曰，『……臣前啓典牧種牛，……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用

(註七四)A. Conrady 不識這幾個字。茲從同事勞貞一先生說改正。

(註七五)A. Conrady, op,cit, p, 89.

(註七六)此字從勞貞一先生說改正。

(註七七)A. Conrady, op, cit, p, 92.

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旣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晉書斠注謂應作「二」）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朝廷從之(註七八)。

這是西晉時的情形。食貨志又載晉安帝元興中孔琳之的話云：

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爲貧，用穀之處不以爲富(註七九)。

由此可知，東晉境內，有些地方固然有錢幣的流通，有些地方却仍舊把穀當作貨幣來使用。除此以外，又有以粟作交易媒介的。如敦煌寫本沙州圖經殘卷（見鳴沙石室碎金卷下）說涼時敦煌刺史楊宣以粟買石來修理云：

北府渠……地下每年破壞。涼時刺史楊宣以家粟萬斛買石修理。于今不壞。

又漢晉西陲木簡彙編第二編買布簡說買布、履等物所付的代價以升計算云：

買布四升　勞文効二升　前幾取廿八升

買履三升　復□□□□

勞陽虎二升　共□□□□

曹倉曹一升　共□□□□

給付的代價既然以升計算，指的當然是穀粟等農產品。

（四）北朝的實物貨幣

關于北朝(386—581)幾近二百年使用實物貨幣的情況，我們最好分爲兩個時期來說，而以魏高祖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6）爲前後兩期的分界。在太和十九年以前，一直上溯至北魏開國，卽拓跋珪改稱魏王的時候（386），總共一百一十年左右，是錢幣完全停止行用的時期。及太和十九年，政府開始鑄錢，名曰太和五銖，錢幣纔開始漸漸流通(註八〇)；自此以後，實物貨幣的使用，可以說是另入一個新時期。

(註七八)事在咸寧四年(278)七月，見晉書斠注卷二六。

(註七九)宋書卷五六孔琳之傳，及通典卷八略同。

(註八〇)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云，『魏初至于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十九年，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鎭皆通行之。』

北魏自開國至太和十九年，錢貨既然無所周流，人們從事買賣時全以實物作貨幣，可以說是實物貨幣在流通界佔絕對支配地位的時代。而在被用作貨幣的實物中，布帛尤其重要。當日的布帛有被用去購買粮食的。如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說農產豐收時，一疋布帛可買八十餘斛云：

> 天興初(398)，……勸課農耕，……自後比歲大熟，疋中八十餘斛。

又同書卷六二李彪傳說政府以官絹購買粮食以備荒云；

> 高祖初，……彪又表曰，『……臣以爲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于倉，時儉則加私之二（通典卷一二作「則減私之十二」）糶之于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高祖覽而善之，尋皆施行。

又同書卷四四薛野賭傳附虎子傳說戍兵以絹購買粮食云：

> （太和）四年，……除開府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飢寒。虎子上表曰，『……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卽自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

復次，當日的布帛又有用來買牛的。上引虎子傳云：

> 虎子上表曰，『……若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足得萬頭。……』高祖納之。

又有用作買賣農具（鐸）的媒介的。魏書卷五二趙柔傳云：

> 高宗(452—465)踐祚，拜爲著作郎。……出爲河內太守，……後有人與柔鐸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于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

又有用來贖身的。同書卷六一張讜傳附忠傳說張讜之妻被掠爲婢，後張讜以布帛千餘匹把她贖回云：

> 初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乃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爲劉駿（宋孝武帝）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母老，

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

又有用來建造佛寺的。同書卷四〇陸俟傳附叛傳云：

興安初（452），……出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長廣公。……徵爲散騎常侍。民乞留叛者，千餘人。顯祖（466—470）不許。……叛之還也，吏民大歛布帛以遺之。叛一皆不受。民亦不取。於是以物造寺焉，名長廣公寺(註八一)。

又有用來支付喪葬費用的。同書卷八七石祖興傳云：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眞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高祖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

又同書卷九四閹官傳抱嶷條云：

太和十二年，……（抱睹生）卒，……賜……繒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

又同書卷六一畢衆敬傳云：

（太和）十五年十月，卒。詔于兗州賜絹一千匹，以供葬事(註八二)。

以上各例都表示布帛是當日買賣物品的媒介。復次，當日的布帛又可用來支付役務的代價。如魏書卷三三公孫表傳附軌傳說公孫軌以絹給驢主作爲驢運糧食的代價云：

出爲虎牢鎮將。初世祖(424—452)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

以上都是北魏人士在太和十九年以前把布帛當作交易媒介來使用的情形。此外，當日的布帛又是價值計算的標準，一切物價都以布帛的匹數或長短來表示。如魏書卷五二趙柔傳說金珠一貫的價值爲數百匹的縑云：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世祖平涼州，內徙京師。……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值數百縑。柔呼主還之。

(註八一)造寺所費的布帛，一方面固然用來支付造寺工匠的工資，他方面也用來購買造寺所用的材料。由於後者，我們也可以看出布帛在當日被用作貨幣來交易的情況。

(註八二)這些支付喪葬費用的布帛，一部份以工資的形式給予從事喪葬工作的人，另一部分則用來購買與喪葬有關的物品，如棺材之類。後一點是當日布帛具有貨幣機能的證明。

又同書卷五二胡叟傳說高閭以價值十餘匹布帛的禮物贈與胡叟云：

（約高宗或顯祖時）高閭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帶，從田歸舍。……閭見其貧，約以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愧。

至于當日司法界對于一切贓物的價值，更是完全以布帛的匹數或長短來計算。魏書卷七上高祖紀載太和八年

六月丁卯，詔曰，『……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

又同書卷一一一刑罰志云：

初盜律：贓四十匹，致大辟。民多慢政。（世祖時）竣其法，贓三匹皆死。（高宗時）諸司官贓二丈，皆斬。

律：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至（太和）八年，始班祿制，更定：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小，皆死。

北魏自太和十九年(495—6)鑄錢以後，錢幣漸漸流通，實物貨幣在流通界佔有的絕對支配地位自要動搖。可是，關于當日錢幣流通的情況，我們不能過于誇張。因爲太和十九年以後，錢幣雖由于鑄造而漸漸流通，但因有下列三種情形，牠的勢力非常有限，不能驅逐布帛于流通界之外：

第一種情形是錢幣流通的稀少。關於這點，我們可舉一事來作證明。太和廿二年，卽太和五銖錢鑄造後的第四年，孝文帝生病，請大夫徐謇給他診治。不久病體痊愈，孝文帝非常高興，下詔給錢一萬貫作診金來酬謝這位良醫。但當日錢幣數量非常有限，政府那裏有這許多錢來作治病之用？因此，後來政府沒有拿出錢來給徐謇，而改給他絹二千匹，雜物一百匹，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及牛十頭(註八三)。

第二種情形是錢幣的地方割據。當日流通的錢，幷不是全國一律，而帶有地方割據的性質。此地的錢，只能在此地行用，攜至其他地方便不能行使，因爲其他地方另有一種可以通用的錢。這種情形，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說得很清楚：

肅宗初，京師及諸州鎮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貿遷頗隔。熙平初(516)，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太和五銖，雖利于

(註八三)魏書卷九一徐謇傳。

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于荆郢之邦者，則礙于兗豫之域。……永平三年(510—1)，……時被敕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延昌二年(513—4)，徐州民儉，刺史啓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澄又奏，『……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典，不朽之恆模，甯可專貿于京師，不行于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便。……』

第三種情形是錢幣品質的惡劣。北魏政府雖然享有鑄幣權，但利之所在，民間多從事私鑄。私鑄者目的既在賺取超額的利潤，其鑄出的錢自然很壞。這種惡劣的錢幣，自世宗熙平年間(516—7)起，即已流通于市上。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云：

自（熙平二年）後所行之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僞既多，輕重非一。……遷鄴之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奏革其幣。……然姦僥之徒，越法趨利，未幾之間，漸復彌薄。

在敬宗孝莊帝時(528—590)流通的錢，又輕又薄，以至爲人說做可以被風吹動，可以在水面浮起(註八四)。而高道穆看見當日行用之錢惡劣，也說，『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註八五)。

當日流通的錢幣既然有這三種缺憾，便給布帛以仍舊用作貨幣的機會。因爲：(1)錢幣數量既然稀少，不足以滿足流通界的需求，布帛便被用作貨幣，以補此缺點；(2)錢幣既然帶有地方割據的性質，此地與彼地貿易時，因爲欠缺兩地共同接受的錢幣，布帛便起而負此任務；(3)錢幣愈濫惡，其價值愈低，買賣時須接受的錢幣則愈多，同時牠的耐久性也不如布帛。這樣一來，錢幣之用作交易工具實在沒有比布帛便利多少，故布帛在市場上仍舊具有貨幣的機能，不因錢幣的流通而失却她原來在流通界的地位。

太和行錢後，布帛之仍保有貨幣的機能，原因已如上述。這裏我們要進一步探討當日布帛怎麼樣發揮牠的貨幣的機能。就地點上說，太和以後河北諸州鎮始終沒有錢幣的流通，布帛之貨幣的機能絲毫不受影響；此外，洛陽以西及以北各州鎮，

(註八四)魏書卷五八楊播傳附侃傳。

(註八五)魏書卷七七高崇傳附道穆傳。

直至孝明帝初年(516)，錢幣還沒有流通，布帛當然也被用作交易的媒介。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說：

> 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裂布帛，壅塞錢貨。……』……澄又奏，『……至于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有錢處，……』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也(註八六)。

復次，就用途上說，太和以後的布帛，有用來購買糧食的。如魏書卷八世宗紀說政府以絹賑濟飢民，讓他們拿來購買糧食云：

> (延昌二年，513)夏四月庚子，以絹十五萬匹，賑恤河南郡飢民。

又同書卷七九鹿悆傳說鹿悆以縑支付禾價云：

> (約世宗時500—515)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悆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悆大忿，卽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返。

又隋書卷二四食貨志說東魏政府以絹糴粟云：

> (東魏)天平元年(534—5)，遷都于鄴。……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

又有用來購買酒肉的。魏書卷七一夏侯道遷傳說夏侯道遷每歲以多量的布帛購買酒肉云：

> (世宗時)尋改封濮陽縣開國侯，……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

又夏侯道遷傳附夬傳說夏侯道遷之子夬也是一樣的酷好飲食，結果因酒肉等費用開支太大而負債千餘疋云：

> 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于口。沽賣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負債，數猶千餘疋。

(註八六)通典卷九略同。

又有用來購買田地的。端方陶齋藏石記卷六張神洛買田券說張神洛以絹九匹購買墓田三畝云：

> 正始四年（507）九月十六日，北坊民張神洛從糸（縣）民路阿鳧買墓田三畝，南齊王墓，北引五十三步，東齊口墓，西引十二步。碩（？）絹九匹。其地保無寒盜。若有人識者，折成畝數，出鳧好口口口官有口口私口。立券文後，各不得變悔。若先悔者，出絹五匹。畫指爲信。書券人潘口。時人路善王。時人路榮孫（註八七）。

又有用來購買造船材料的。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說：

> （肅宗時，516—528）三門都將薛欽上言，『……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

又有用來買塼的。魏書卷一九中任城王雲傳附澄傳云：

> （肅宗時）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甯，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以上百鞭以下收贖之物，絹一疋，輸磚二百，以漸修造。』詔從之。

又有用來贖身的。魏書卷七一裴叔業傳附植傳說裴植之母捨身爲沙門寺婢，後爲諸子各以布帛數百匹贖免云：

> （世宗時）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箒，于沙門寺洒掃；植弟瑜粲桁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

又有用來買官的。魏書卷一五昭成子孫傳云：

> （世宗時，拓跋暉）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疋，次郡一千疋，下郡五百疋，其餘受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

又有用來支付喪葬費用的。魏書云：

> （太和）十九年，薨于代。……又勅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卷八三上外戚傳馮熙條）
>
> 延昌二年冬，……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卷九〇逸士傳馮亮條）

（註八七）此券又見于羅振玉地券徵存，及鄒安藝術叢編。券文刻于專上，專出涿州。

靈太后聞……其死，……遂賜帛三百匹，黃（北史卷九二本傳多一「綾」字）十匹，以供喪用。（卷九四閹官傳孟鸞條）

此外，又有用來支付役務的代價的。魏書卷六七崔光傳說以錢帛來租賃車馬云：

是（熙平元年）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賃馬假乘，交費錢帛。……』

又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說以布帛雇車運送貨物云：

（肅宗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雇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雇價布五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其陸路從濡陂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

上述布帛的用途，偏于交易媒介方面。復次，當日的布帛又可用來表示物價，即具有價值單位的機能。如魏書卷五七崔挺傳附孝暐傳說趙郡一斗粟的價格爲縑數匹云：

孝莊初（528），……尋除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戶喪亡，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縑。

又魏書卷一一一刑罰志說東魏時司法界以布帛匹數來計算贓物的價值云：

至遷鄴，京畿羣盜頗起，有司奏立嚴刑：諸彊盜……贓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爲樂戶。小盜贓滿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

以上都是北魏自太和十九年行錢後一般人把布帛當作貨幣來使用的情形。北魏末葉，分裂爲東西魏，不久復爲高氏及宇文氏所篡，改國號爲北齊（550—577）及北周（555—581）。這時政權雖有改變，布帛却仍然一樣的被用作貨幣來交易。在北齊方面，『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絹布』（註八八）。可見這時候的河北，還是北魏以來廢錢用布帛的狀態。至于北齊其他地方，錢幣雖然流通，布帛仍被用作交

（註八八）隋書卷二四食貨志。通典卷九略同。

易的媒介。如北齊書卷九穆后傳說齊後主以三萬匹錦綵購買眞珠云：

> 屬周武遣太后喪，（後主）詔侍中薛孤康買等爲弔使，又遣商胡齎錦綵三萬匹，與弔使同往，欲市眞珠，爲皇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交易，然而竟造焉。

同時又具有價值單位的機能。如北齊書卷八後主紀說：

> 一裙直萬匹。

復次，在北周方面，人們也把布帛當作貨幣來買賣。如周書卷二七赫連達傳說赫連達以繒帛支付羊價云：

> 保定初（561），遷大將軍，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

又同書卷三七寇儁傳說寇儁家人賣物得絹云：

> 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五匹。儁于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慢飲。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遂訪主還之。

同時，贓物的價值亦以布帛匹數來計算。周書卷六武帝紀載建德六年（577）十一月，初行刑書，要制：持杖羣彊盜一匹以上，不持杖羣彊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小盜及詐僞請官物三十匹以上……者，至死刑(註八九)。

（五）南朝的實物貨幣

當布帛在北朝市場上被用作主要貨幣來交易的時候，南朝(420—589)錢幣的流通，因爲商業比較發展(註九〇)，却日漸重要，大有取實物貨幣的地位而代之的趨勢。不過，南朝錢幣的流通量雖較北朝爲多，勢力雖較北朝爲大，但因有下列兩種情形，故仍予實物貨幣以流通機會：

第一種情形是錢幣數量的稀少。這在南朝初年，情形尤爲嚴重。當日的錢幣，承繼着前代戰亂頻仍，有毀無鑄的狀態，數量非常稀少。宋書卷六六何尙之傳載元

(註八九)隋書卷二五刑法志略同。

(註九〇)如南史卷七〇郭祖深傳載梁武帝（502—549）時郭祖深上封事云，『今商旅轉繁，游食轉衆，耕夫日少，杼軸日空。』

嘉二年(425)四月，

中領軍沈演之以爲，『龜貝行于上古，泉刀興自有周，……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採鑄久廢，兼喪亂累仍，摩散湮滅，何可勝計？……』

又同書卷七五顏竣傳亦說：

（孝建）三年(456—7)，尚書右丞徐爰議曰，『……年歷既遠，喪亂屢經，堙焚剪毀，日月銷減，貨薄民貧，公私俱困。……』

爲着補救錢幣的缺乏，政府曾經設法增鑄。但當日鑄造錢幣所用的銅，并不是大規模的採自銅鑛，而是零零星星的取給于民間的銅器，原料既少，鑄出的錢幣自不會多。宋書卷六〇范泰傳說：

時（永初二年，421—2）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錢。泰又諫曰，『流聞將禁私銅，以充官銅。……臣愚意異，不甯寢默。……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于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

又同書卷七五顏竣傳說：

（孝建三年）竣議曰，『……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事絕，器用日耗，銅幾轉少，器亦彌貴。……今百姓之貨，雖爲轉少，……』

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況今耕戰不用，采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方今……公私所乏，唯錢而已。……』

到了南齊永明八年(490—1)，政府看見鎔銅器鑄錢的不是辦法，乃開採四川蒙山銅鑛來鑄錢；但鑄造千餘萬文以後，卒因『功費多，乃止』(註九一)。

第二種情形是錢幣品質的惡劣。在鑄錢原料（以銅爲主）缺乏的情形下，鑄出的錢幣不是數量稀少，便須品質惡劣，二者必有一于此。在南朝初年，政府的鑄錢政策偏向前者，已如上述。不過這種政策維持不了多久，因爲錢幣品質雖好，但數量太少，實不足以供應當日市場上的需求。因此，自宋孝武帝（454—464）即位以

(註九一)南齊書卷三七劉悛傳。

後，政府便開始採取傾向後者的鑄錢政策，即不管成色的好壞，但求數量的增加。錢的成色既然低下，鑄造成本自可減輕，但錢的面值却仍舊一樣。這樣一來，因鑄錢成本與錢值相差而生的超額的利潤，便給私鑄者以一個很大的鼓勵，從而劣錢的數量便多起來。南史卷三四顏延之傳附竣傳云：

> 及孝武即位，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于是人間盜鑄者雜以鉛錫，竝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註九二)。

又宋書卷七五顏竣傳云：

> 時（宋孝武帝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議者將爲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紓民。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于官無解于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前廢帝即位(464)，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効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鏟，如今之剪鑿者，謂之耒子。景和元年(465)，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于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註九三)。

這都是劉宋時代錢幣品質惡劣的情形。到了南齊，錢的成色也很低下。南齊書卷三七劉悛傳云：

> 建元四年（482—3），奉朝請孔顗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爲，『……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頃盜鑄新錢者，皆効作剪鑿，不鑄大錢也。摩澤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皆淄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淄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

(註九二)宋書卷七五顏竣傳略同。

(註九三)南史卷三四顏延之附竣傳略同。

姦。……』

再往後，到了梁武帝普通年間(520—7)，政府乾脆把錢幣中的銅剝削淨盡，改以鐵鑄錢。結果，錢幣品質更爲惡劣，價值更爲低下，以致『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不復計數，而唯論貫』(註九四)。

由于上述的兩種情形，南朝布帛等實物便不因錢幣的流通而失却牠的貨幣的機能。因爲南朝的錢幣在初年既然爲數不多，實物貨幣遂仍被使用，以補救當日交易籌碼的不足。其後，錢幣數量雖較前增多，但成色方面却因銅的減少和鉛、錫、鐵的參入而降低，于是惡劣到『入水不沉，隨手破碎』，或須『摩澤淄染』始能行用，否則賣物得錢後等于沒有得到代價。這種品質惡劣的錢幣，在使用上，實在幷不比布帛便利多少：就耐久性上說，布帛較爲牢固，不至于隨手破碎；就攜帶方便說，布帛有時也不一定要用車載往市場，始能交易。因此，南朝錢幣的流通，雖較北朝爲盛，布帛等實物仍可以貨幣的資格出現于市場上。

現在我們進一步探討南朝人士把布帛等實物當作貨幣來使用的情形。就地點上說，漢中一帶在南朝初年還沒有錢幣的流通，交易時完全以絹作媒介。宋書卷八一劉秀之傳云：

（元嘉）二十五年(448—9)，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甯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先是漢川(註九五)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

至于就用途上說，當日的布帛有用來買梨的。宋書卷七六王玄謨傳說：

玄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

又有用來支付馬價的。南齊書卷二七劉懷珍傳云：

初（宋）孝武世，太祖（蕭道成）爲舍人，懷珍爲直閤，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上有白驃馬鬬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或謂懷珍曰，『蕭君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甯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

又有用來營建佛寺的。同書卷四一張融傳云：

(註九四)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註九五)卽今漢中一帶。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云，『南鄭，舊置漢川郡。開皇初，郡廢。』

（宋）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襯錢帛，融獨襯百錢。

又有用來支付喪葬費用的。宋書卷九二徐豁傳云：

（元嘉）五年，……卒，時年五十一。太祖又下詔曰，『……可賜錢十萬，布百匹，出營葬事。』

以上都是當日布帛被用作交易媒介的例子。復次，當日布帛又是價值計算的標準。如魏書卷五二胡叟傳說蜀沙門法成以價值布帛千餘匹的珍物送與胡叟云：

時蜀沙門法成鳩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宋文帝）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卽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免焉。復還于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值千餘匹。叟……一無所受。

又宋書卷四二王弘傳說政府以布帛的匹數計算贓物的價值云：

弘……與八座丞郎疏曰，『……又主守偸五匹，常偸四十匹，竝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偸十匹，常偸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卽得小寬民命，亦足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懷。』左丞江奧議，『士人犯盜贓，……』

上述布帛的貨幣的用途，偏于南朝上半期。其後，到了梁初（502），錢幣的流通區域仍只限于沿長江流域各大都市及其附近，其餘州郡則多以穀帛作貨幣來交易。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云：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註九六）。

就是在這些錢幣流通的區域中，事實上布帛等實物仍以貨幣的資格出現于市場上。如魏書卷九八島夷傳說梁侯景亂時，首都軍人屠牛出賣，得絹甚多云：

（蕭）衍城（首都建業）內大飢，人相食，米一斗八十萬。皆以人肉雜牛馬而賣之。軍人共于德陽堂前立市，屠一牛得絹三千匹，賣一狗得錢二十萬。

又南史卷九陳本紀載梁紹泰元年（555—6）北齊入侵時，石頭（建業的一部份）城中以米買水及以絹買米云：

（石頭）城中無水，水一合貿米一升，一升米貿絹一匹。

再往後，到了陳代（557—588），由于錢幣的惡劣與紊亂，人民在市場上買賣時還是

（註九六）通典卷九同。

『兼以粟帛爲貨』；至於嶺南諸州，則『多以鹽米布帛交易，俱不用錢』(註九七)。同時因與陳作戰而作俘虜的北周軍官龐晃，後由北周贖回，其代價爲絹八百匹(註九八)，錢則一文也沒有。

(六)隋代的實物貨幣

南北朝末葉，楊堅統一南北，改國號曰隋。隋代(581—688)的錢幣，由于私鑄的盛行，品質也很惡劣。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云：

> 其(開皇十年，590—1)後姦狡稍漸磨鏇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錫錢，遞相倣效，錢遂輕薄。……十八年，……是時錢益薄惡。……大業已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年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翦鐵鍱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

再加以過去幾及四百年的使用實物作貨幣的傳統的習慣，布帛等實物自然要保有貨幣的機能。

隋代的布帛，在日常各種用品的買賣中，都可用作交易的媒介。如隋書卷四九牛弘傳說政府規定以縑一匹易書一卷的價格，大量的收買書籍云：

> 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祕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上納之，于是下詔獻書一卷，費絹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又同書卷五五乞伏慧傳說乞伏慧以絹買魚云：

> 俄轉荆州總管，……曾見人以籠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籠。

又全隋文卷二八鄭辨志宣州稽亭山妙顯寺碑銘說以錢絹作購買乳藥之用云：

> (開皇)十一年秋八月，帝降璽敕：遣大將軍楊榮送師歸山，……賜錢五千貫，絹二千疋，充乳藥。

又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一二說隋文帝后及其臣民敬施錢絹，以作購買佛經佛像之用云：

> 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隋皇帝佛弟子姓名敬白：……今于三寶前悉爲發露

(註九七)隋書卷二四食貨志，通典卷九。

(註九八)隋書卷五〇龐晃傳。

懺悔，敬施一切毀廢經像絹十二萬匹，皇后又敬施絹十二萬匹，王公以下爰至黔黎又人敬施錢一文。

這都是布帛在隋代被用作交易工具的證明。復次，當日的物價又多以布帛的匹數來表示。如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云：

是歲（大業元年，605—6）翟雉尼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

以上都是隋人把布帛當作貨幣來使用的情形。此外，當日的粟也具有貨幣的機能。如太平廣記卷一三四竹永通引異錄說竹永通家以粟贖牛云：

隋幷州孟縣……寺家生一黃犢，足有白文。……竹永通……家……遂用粟百石，于寺贖牛。

（七）唐代的實物貨幣

布帛等實物的用作貨幣，到了唐初（618）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唐代人士承繼着這種歷史悠久的習慣，在市場上還是一樣的喜歡以布帛作貨幣來交易，直至安史之亂(755—762)左右，情形始有改變。

在由唐初至安史之亂的百餘年內，人們把布帛拿到市場上可以買到各種商品。就文書的記載上看，有用來購買糧食的。如唐吳兢貞觀政要卷一政體第二說貞觀初(627)米價昂貴，一匹絹只能買到一斗米云：

太宗自卽位之始，霜旱爲災，米穀踊貴。……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飢饉尤甚，一匹絹纔得一斗米。

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亦云：

貞觀初，……絹一疋易米一斗。

陸贄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亦載此事，但改絹爲縑：

貞觀之初，荐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縑。

又唐會要卷八三租稅說貞觀年間以絹買粟，前後多寡不同云：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往者貞觀之初，率土荒儉，一匹絹纔得一斗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註九九)。

又舊唐書卷九七郭元振傳說武后時涼州粟價低廉，一匹絹可買數十斛云：

(註九九)貞觀政要卷六及資治通鑑卷一九五貞觀十一年八月甲子條略同

大足元年(701)，遷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數年豐稔，乃至一匹絹粟數十斛(一〇〇)。

宋孔平仲續世說卷二亦載此事云：

郭元振在涼州五年，……置屯田，數年豐稔，至一絹糴數十斛。

復次，又有用來購買柴薪的。舊唐書卷五七劉世龍傳說政府出賣柴薪，得布帛甚多云：

義節進計曰，『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薪貴而布帛賤。若採街衢及苑中樹爲樵以易布帛，歲收數十萬匹，立可致也。……』高祖並從之，大收其利。

又有用來購買書籍的。新唐書卷七八宗室傳說：

（高宗）各賜市書絹二百疋。……

太平廣記卷四四八何讓之引乾臊子亦說：

唐神龍(705—7)中，盧江何讓之赴洛，遇上巳日，將陟老君廟，瞰洛中遊春冠蓋。廟之東北二百餘步，有大丘三四。……讓之獲此書帖，喜而懷之，遂躍出丘穴。後數日，水北同德寺僧志靜來訪讓之，說云，『前者所獲丘中文書，非郎君所用，留之不祥。……郎君必能却歸此，他亦酬謝不薄。其人謂志靜曰，「吾已備三百縑欲贖購此書」，如何？』讓之許諾。志靜明日挈三百縑送讓之。……

又有用來買紙的。太平廣記卷一二一邢文宗引冥報拾遺云：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稟性麤險。貞觀年中，……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匹。迴澤無人，因卽刼殺。此人云，『將向房州，欲買經紙。』終不得免。

又有用來買藥的。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一云：

任之選與張說同應舉。後說爲中書令(註一〇一)，之選竟不及第，來謁張公。公遺絹數束，以充粮用。之選將歸至舍，不經一兩日，疾大作，將絹市藥。

(註一〇〇)新唐書卷一二二郭震傳略同。

(註一〇一)張說於玄宗初年爲中書令，見舊唐書卷九七本傳。

絹盡疾自損。

又舊唐書卷一九二隱逸傳道士司馬承禎條云：

（玄宗）賜絹三百匹，以充藥餌之用。

又有用來買魚的。唐唐臨冥報記卷下云：

初嘉運在蜀，蜀人將決取魚。嘉運時爲人講書，得絹數十匹，因買他魚放之。贖生謂此也。貞觀中，車駕在九成宮聞之，使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問其事。

又有用來買地的。唐韋述兩京新記卷三說鄒鳳熾擬以每樹估絹一匹的代價購買終南山云：

南門之東，舊有富商鄒鳳熾宅。鳳熾……又嘗謁見□高祖（太平廣記作『高宗』），請市終南山，山中每樹估絹一匹。自云，『山樹雖盡，而臣絹未竭。』事雖不行，終爲貴賤之所驚（註一〇二）。

又有用來支付造船費用的。新唐書卷二二〇高麗傳云：

（太宗）乃詔劍南大治船。蜀人願輸財江南，計直作舟，舟取縑千二百。

又有用來買馬的。張說張燕公集卷七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奉勅撰云：

于斯之時（麟德年間，664—6），天下以一縑易一馬。

又近代在吐魯番三堡出土的唐上元二年買馬私契，原文雖已不全，但由于下引王樹枏氏的考證，我們還可看出當日馬的購買是以帛練支付馬價的。王樹枏新疆訪古錄卷二唐上元二年買馬私契云：

往見德人司代恩（當卽 Aurel Stein ——漢昇）在于闐所得建中元年買牛私契，與此契大致相同。此紙出吐魯番三堡，卽唐高昌地。『碎葉』爲唐四鎮之一。唐書馬耆都督府下云，『貞觀十一年滅焉耆，置有碎葉城。』故舊書有焉耆而無碎葉，蓋一地也。』趙文同交用下『帛練』字，已破爛不完。『邊買』乃西方土語，今時猶然。涼州人稱馬口齒若干曰幾敦口齒，此云『紫敦六歲』，亦此意也。『退上』卽『腿上』。『寒盜』二字亦當時俗語，言人貧寒而爲盜者。當日買賣多以練計。此因保人未集，先立私契，猶

（註一〇二）太平廣記卷四九五鄒鳳熾引西京記略同。

今交易先立訂也(註一〇三)。

又有用來買牛的。在日本中村不折氏所藏的西域官文書景片中，有一片爲買牛契，內有以練(註一〇四)八匹買牛一頭的記事：

開元廿九年六月十日，眞容寺於于闐城交用大練捌匹，買與胡安忽娑烏牸特牛一頭，肆歲。其牛及練，卽日交相付了。如後牛有寒盜，幷仰主保知當，不忏買人之事。兩主對面，畫指爲記。練主□□□。牛主安忽娑，年卅□押。保人安失藥，年卅二。見人公孫策(註一〇五)。

又有用來購買猿猴的。太平廣記卷四四五孫恪引傳奇說高力士以帛一束買猿云：

僧方悟此猿是貧道爲沙彌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憐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

中唐以前，人們拿布帛到市場上去，可以買到各種商品，已如上述。復次，這些攜有布帛的人又可雇賃牛、馬、駝、騾、驢及車，以供自己使用。當日人們因取得這種役務而支付的代價，通常以三尺絹一天爲度。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註一〇六)卷四云：

疏議曰：庸謂私役使所監臨及借車馬之屬。計庸一日，爲絹三尺，以受所監臨財物論。

平功庸者，計一人一日爲絹三尺，牛、馬、駝、騾、驢、車亦同。

疏議曰：計功作庸應得罪者，計一人一日爲絹三尺。牛、馬、駝、騾、驢、車計庸，皆準此三尺，故云亦同。

疏議曰：假有借驢一頭，乘經百日，計庸得絹七疋二丈。

又同書卷六云：

馬庸一日，爲絹三尺。

安史之亂以前的唐人，除如前述把布帛當作交易工具來使用外，同時又以牠作

(註一〇三)又見於中國學報第九期王樹枏新疆訪古錄。

(註一〇四)練是潔白而不染色的熟絹(亦布帛中的一種)。

(註一〇五)原文見於金祖同唐西域官文書佚存，說文月刊第一卷第八期。

(註一〇六)此書撰於唐高宗永徽年間(650—6)。

爲價值的標準。如通典卷九註說諸郡貢獻土產，價值均以絹五十匹爲限云：

按令文，諸郡貢獻，皆取當土所出，准絹爲價，不得過五十匹，並以官物充。

又唐律疏議卷六說以布帛匹數計算贓物的價值云：

疏議曰：假有以私物五匹貿易官物直九匹，五匹準盜，合徒一年，計所利四匹，合杖九十。

又資治通鑑卷一八九說武德年間(618—626)洛陽鹽粟等價格均以布、絹表示云：

（武德四年三月庚申）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絹一疋直粟三升，布一匹直鹽一升。

又同書卷一九三說貞觀元年(627—8)的米價以絹表示云：

（貞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

同書卷一九五亦云：

（貞觀十一年八月甲子）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貞觀之初，天下飢歉，斗米直匹絹。……』

又唐律疏議卷一五說畜產的價格以絹計算云：

減價，謂畜產直絹十疋，殺訖唯直絹兩疋，卽減八疋價。

又同書說馬價以絹計算云：

疏議曰：一事分爲二罪者，假將私馬直絹五疋，博取官馬直絹十疋，依律貿易官物，計其等準盜論，計所利以盜論，須分官馬十疋出兩種罪名。(卷六)

假有殺馬直十五匹絹，準盜合徒二年。（卷一五）

馬本直絹十匹，爲觝殺，估皮肉直絹兩疋，……（卷一六）

又同書卷四說驢價以絹表示云：

疏議曰：假有借驢一頭，乘經百日，計庸得絹七疋二丈。驢估止直五匹。此則庸多，仍依五匹爲罪。

又同書卷二〇說奴價以絹計算云：

假將私奴貿易官奴，其奴各直絹五匹，其價雖等，仍準盜論，各徒一年。註云，『官物賤亦如之。』謂私奴直絹十匹，博官奴直絹五匹，亦徒一年。

假有監臨之官，以私奴婢直絹三十匹，貿易官奴婢直絹六十匹，卽是計利三十匹，監臨自盜合絞。

上述中唐以前被用作貨幣的實物，多偏于布帛方面。復次，當日北至黃河流域，南至嶺南，又有把其他實物當作貨幣來交易的。如資治通鑑卷二四二載長慶元年九月壬子，

戶部尙書楊於陵以爲，『……大曆(766—780)以前，淄、靑、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

又高力士在長安北澧水設立水磨，其所收租金是以斛計算的。新唐書卷二〇七宦者傳高力士條說：

都北堰澧列五磑，日傢三百斛直。

這種以斛計算的物品，據舊唐書卷一八四本傳，是指麥而言。由此可知，麥在當日也是交易的媒介。

(八)從敦煌寫本中所見的實物貨幣

關于中古時代實物貨幣的流通，除如上述散見于各史籍者外，我們又可據近世在敦煌發見的寫本來探討當日西北人士把實物當作貨幣來交易的情形。可是，因爲現在根據的敦煌寫本(註一〇七)大都沒有年號，我們很難斷定牠們的確實年月，故只好另闢一節來加以敍述。不過，這些寫本如果是屬于中唐以前的材料，那末，牠們和作者中唐以前實物貨幣盛行的論斷正相符合；如果是屬于中唐以後的，那亦不足爲奇，因爲西北地方較爲偏僻，受貨幣經濟的影響較遲，故中唐以後仍舊把實物當作貨幣來使用，也是很可能的事。

(註一〇七)關於敦煌寫本的材料，近年已經印出不少。可是，就作者現在根據的材料而論，實在只是初步的探討，絕對不能說是深入的研究，因爲事實上還有許多材料是作者所沒有看到的：(1)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似已將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者完全印出，但事實上在有些寫本背後書寫的零碎材料，如賬目等，雖是第一等的經濟史料，卻被遺漏去了！如向達氏在敦煌叢抄印出的僧人唱曲賬目(成字九十六號目蓮變文第三種背面)，我們在敦煌雜錄中便沒有找到。(2)倫敦英國博物院收藏的敦煌寫本尙未印出，作者所根據的只是沙州文錄中所收的一小點，及日本法律史學者玉井是博親自在倫敦抄出的三幾條而已。

在敦煌寫本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日西北人士常常把麥粟及米等農產物當作貨幣來交易。如劉復敦煌掇瑣五八張骨子買屋契說以麥粟購買房屋云：

> 叁年丙辰歲十一月□□日，兵馬使張骨子緣無屋舍，遂買兵馬使宋欺忠上件准尺數舍居住。斷作舍價物，計斛斗陸拾捌碩肆斗，內麥粟各半。其上件舍價物，立契日幷舍兩家各還訖，幷無升合欠少，亦無交加。其舍一買後，任張骨子永世便爲主記居住。……恐後無憑，故立此契用爲驗耳。

又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註一〇八)下輯沈都和賣地契(生字二十五號)說以谷(『穀』之俗字)米支付屋價云：

> 慈惠鄉沈都和斷作舍物，每尺兩碩貳斗五升。准地皮尺數竿(按卽『算』字——漢昇)著，舍櫝(價？)物貳拾玖碩伍斗陸升□舍五圭乾濕谷米。其捨(舍？)及當日交相分付訖，並無升合玄(懸)欠。自賣後，一任丑撻男女收餘居主(住？)。……兩共面對平章爲定，准格不許休悔。……恐人無信，故立私契，用爲後憑。

又羅福萇沙州文錄補還舍賈契(上虞羅氏藏)說房價以升合計算，當然也是就麥粟或穀米等農產品說的：

> 乙丑年四月廿八日，於都頭王保定邊舍地賈，升合不欠，並總乾濕塡還足。……恐人無信，故勒私契，用爲後憑。還舍賈人都頭王保定。知□人王再定。

除房屋的買賣外，其他物品的買賣也多以麥粟來作交易的媒介。如倫敦英國博物院藏 Stein 搜集品第五八二絹號說以麥買牛云：

> (上闕)識認者，一仰本主賣上好牛充替。立契後，有人先悔者，罰麥三石，入不悔人。恐人不信，古(故)立此契爲記。麥主□□□。牛主尼僧明相，年五十五。保人尼僧淨勝(？)，年十八。保人僧實照。保人王忠敬，年廿六。見人尼明兼(註一〇九)。

又敦煌掇瑣五一兵馬使徐留通借絹券說徐留通從佛寺借絹，後把麥粟當作絹價來還

(註一〇八)以下簡稱敦煌雜錄。

(註一〇九)見玉井是博支那西陲出土的契，日本京城帝國大學創立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史學篇。

給佛寺云：

乙巳年六月五日，立契：龍興寺上座深善光於（？）官中有恩澤涓（絹）柒疋，當便兵馬使徐留通，招將覓職，見便頃（填）還得諸雜涓（絹）價兩疋半，更殘肆疋半絹。諸雜新當阻（？）更五年頃（填）還者，其涓（絹）壹疋，斷價貳拾貳碩已來，自後更不許道少說多者。兩共面對平章。恐後無憑，故立此契，矚字爲定。

還涓（絹）人兵馬使徐留通知（原註：知是花押）。

還人徐留□同知（同知是花押）。

還涓（絹）人弟徐盈達知（知是花押）。

見人索流住十（十是花押）。

丁未年三月十三日，還得高（？）三疋半，麥粟拾碩。通（還絹人署名）。

這種先取絹後還麥的交易，也就是現今買賣中先取貨後給價的延期付款（deferred payment）的辦法。除此以外，當日的麥又可用來支付役務的代價。如敦煌雜錄下輯書幡帳目（鳥字八十四號）說以麥作借用牛及牛具的租金云：

三月五日，使牛具種兩日，折麥一石。

又使牛兩日，折麥一石。

以上是麥粟及穀米等農產物被用作交易工具的情形。復次，當日的麥又是價值的標準，許多物品的價值都折成麥的數量來計算。如敦煌雜錄下輯僧慈燈與氾英振造佛堂契（鹹字五十九號）說：

其麥，平章日付布壹疋，折麥肆碩貳斛。

又同書下輯書幡帳目亦說：

又布一疋，折麥肆碩二升。

靴□，折麥肆碩貳斗。……又鑼一具，折麥貳碩貳斛。

八宗布二丈壹，花氈壹領，折麥陸碩。

除麥粟及穀米等農產品以外，當日西北人士又把布帛當作貨幣來使用。如燉煌掇瑣五三宋重借騧券說以生絹作爲租賃騧畜的代價云：

丙午年正月廿二日，洪潤鄉百姓宋重□□使西州（今新疆吐魯番），欠少騧

畜，遂於同鄉百姓ム專甲面上，故(雇)八歲馭駾一頭，斷作駾價生絹一疋。正月至七月，便須填還。……

又敦煌雜錄下輯張修造雇五歲父駾約（殷字四十一號）說以官布雇駾使用云：

癸未年四月十五日，張修造遂於西州充使，欠闕駾棄（畜？），遂於押衙王道之面上雇五歲父駾壹碩（頭？），斷作駾價官布十六疋，長柒捌，到日送納。

同書下輯張修造雇六歲父駾契（殷字四十一號）亦云：

癸未年七月十五日，張修造王（？）於西州充便（使），欠闕馳(駾？)畜，遂於押衙價延德面上，雇六歲父駾一頭，斷作駾價官布拾个（疋？），長二丈六七。使入了，限三日便須田（填）還，更不許推言（延）。

又沙州文錄補村鄰結義賑約（藏倫敦博物館）說以布帛支付喪葬費用云：

或孝家營葬，臨事主人須投衆共助誠，各助壹疋。

又倫敦英國博物院 Stein 搜集品第四四四五號云：

己丑年十二月廿二日，龍家何願德於南山買買，欠小（少）褐，遂於永安寺僧長千面上，貸出褐參段，白褐壹段。比至南山到來之日，還褐六段。若東西不平善者，一仰口承弟定德丑子面上取本褐。若不還者，看鄉原生利。恐人無信，故立此契，用爲後憑。口承弟定德。口承丑子。收褐人何願德(註一一〇)。

這裏的『買買』二字，如原文無誤，當卽購買物品之意。因購買物品而欠少褐布，從而向佛寺借貸，可見當日褐布實可被用作交易的工具。復次，何願德向佛寺借到的褐布爲四段，其後則歸還六段，其中多還的兩段，可以說是利息，或可看作取得那四段褐布的用益權(Usufruct)的代價。

（九）總結

總括上述，可知中國貨幣的流通，從漢末以後，發生一個激劇的轉變，卽錢幣的使用日漸減少，而實物貨幣的流通則日盛一日。這種當作貨幣來使用的實物，以穀、米、麥、粟等農產品，及縑、絹、布、帛、綾、綵、練、褐、綿、繒等布帛類

(註一一〇)見玉井是博支那西陲出土的契，日本京城帝國大學創立十周年記紀論文集史學篇。

爲最多。至於就時間上說，在漢末魏初，五胡亂華時代，及北魏上半期，實物貨幣的勢力都曾發展到最高的程度，因爲這幾個時期錢幣的流通量都非常稀少，或甚至沒有。至於其餘各朝代，同時雖有錢幣的流通，實物貨幣在市場上還是佔有相當的優勢。其中只有南朝，或者有些例外。南朝實物貨幣的流通，由於錢幣使用的比較發達，如果和同時間的北朝那種盛況比較起來，自然要相形見拙。可是，雖然是這樣，南朝錢幣的流通區域，到了梁初，還只限於沿長江流域的各大都市及其附近，其他地方則多以穀帛作貨幣來交易。因此，就大體上說，自漢末以後，至安史之亂左右，一共五百多年之久，實物貨幣在中國各地的市場上都佔有相當雄厚的勢力。

第三章　中古的實物租稅與徭役

（一）魏晉時代的實物租稅與徭役

中國自漢末以後，由於錢幣流通的稀少或缺乏，人民於買賣時多改用實物作貨幣來交易，情形已如前述。復次，當日人民向政府繳納的租稅，由於錢幣的缺少，也不復能夠如漢代那樣以錢繳納算賦或口錢，而須改用實物。因此，當曹操執政的時候，便於建安九年(204)九月頒佈改用實物繳納租稅的法令：

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註一一一)。

曹操這種規定以綿絹繳納戶調，及以農產品繳納田租的辦法，是漢代以來稅制上一個很大的變動，同時又給中古租稅制度奠下一個深固的基礎。固然，兩漢和曹魏政府徵收的田租同樣以農產物爲主，但曹魏政府向人民徵收綿絹的戶調，却和漢代以錢繳納的算賦有很大的差別(註一一二)。

承繼着曹魏以來實物租稅的制度，晉代的稅制規定得更爲週密。晉書卷二六食貨志云：

(註一一一)魏志卷一武帝紀引魏書。晉書卷二六食貨志略同，但關於田租則作『畝粟四升』。又魏志卷一二何夔傳，卷二三趙儼傳亦有以綿絹繳納戶調的記事，可參看。

(註一一二)戶調與算賦的差別，除卻錢幣與綿絹的不同外，又有丁與戶的差異。漢代的算賦，以丁計算。曹魏的戶調，則按戶徵收。因爲當日社會騷動得很利害，人口數目不易調查清楚，故只好將就一下，改爲按戶徵收。

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

又初學記卷二七云：

晉故事：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疋，綿三斤。

可見這時政府的稅收，還是和漢末以來一樣，完全以實物爲主。每一戶所納的綿絹，在數量上固然要比曹魏時多三分之一，但其爲實物，則沒有根本的不同。至於田租，在曹魏時爲每畝四升，在晉代則一男一女共占田百畝的戶，共輸四斛，數量更是完全一樣。復次，當日又有課田的辦法，卽規定人民除耕種各自所占的田以外，有被國家課耕若干畝，而各人也必須代耕的義務。這實在是當日人民向政府提供的一種徭役。這種徭役，只有遠夷纔可輸納義米——極遠者則人輸錢二十八文——來免除，大多數人民都要直接提供。這和漢代規定人民可以出錢免役的辦法比較起來，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上述以綿絹繳納戶調的規定，只是一般的辦法。事實上，當日各地的物產多不相同，故晉代法令又規定各地可以其他實物代替綿絹來繳納戶調。如初學記卷三七云：

晉令：其趙郡、中山、常山國輸縑當絹者，及餘處常輸疏布當綿絹者，縑一匹當布六丈，疏布一匹當絹一匹，絹一匹當綿二斤。

又太平御覽卷九九五云：

晉令曰：其上黨及平陽輸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當絹一疋。課應（應課？）田者，皋麻加半畝。

西晉末葉，五胡入侵，北方不復爲晉所有。這時北方的政權雖不屬於晉室，但其實物租稅的辦法却仍舊沒有多大的改變。如晉書卷一〇四石勒載記說後趙以布帛及農產品爲戶調田租云：

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貲二匹，租二斛。

又同書卷一二一李雄載記說李雄割據下的四川徵收穀及綿絹等實物云：

其賦，男子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

至於南渡後的晉室，其稅收仍以實物爲主(註一一三)，不過在內容方面却有不少的改變。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云：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其田，畝稅米二斗（通典卷五作『升』）。蓋大率如此。

其中關於田稅的徵收，晉書卷二六食貨志亦云：

咸和五年(330—1)，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

哀帝卽位(362)，乃減田租，畝收二升。

孝武太元二年(377—8)，除度定（此字據通典卷四加入）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

由此可知，晉室南渡後的稅制，曾經有不少的變動：(1)按戶徵收的戶調，除綿絹外，又徵收布絲等物；(2)按戶徵收的田租，規定以米繳納；(3)男丁每歲供役二十日，幷須於十八人中出一運丁供役，以代替西晉時的課田義務；(4)除按戶徵收的多少一致的田租（定田收租）外，又按各人田畝的多少徵收田稅，或田租（度田收租）。此二制至太元二年完全廢除，改爲王公以下每口稅米三斛。不過，我們在這裏要注意的：不管東晉的稅制怎麼樣複雜或變動，政府從人民那裏徵收到的，仍以實物及力役爲主，這一點完全和前代一樣，幷沒有發生根本上的變動。

（二）北朝的實物租稅與徭役

北朝人民負擔的租稅，由於錢幣的缺乏，完全用實物來繳納。當日政府的稅收，承繼着曹魏以來的制度，也是以戶調與田租爲主。在太和八年(484—5)以前，

(註一一三)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云，『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由此可知，東晉的交易稅是徵收錢幣的。不過，由於當日錢幣的稀少，我們對於牠在政府全部收入中所佔的比例，似不能估計得過高。

政府假定全國各戶的貧富程度都是一樣，對各戶課以同樣的稅率，卽『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註一一四)。不過，這只是一般的辦法；有時政府徵收物品的種類與數量，却因地而異。例如延興三年(473)七月，高祖孝文帝詔，『河南六州之民，戶收絹一疋，綿一斤，租三十石』(註一一五)。又如太和四年(480—1)左右，淮南『居邊之民，……小戶者一丁而已，計其徵調之費，終歲乃有七縑』(註一一六)。

到了太和八年，因爲要班給百官的俸祿，政府遂增加稅率，計『戶增帛三疋，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後增調布帛滿二疋。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十九州，貢綿、絹及絲；幽、平……皆以麻布充數』(註一一七)。

上述北魏太和八年以前的稅率，最使我們一時感到奇怪的是：每一戶繳納的田租爲什麼多到二十幾三十石？這一點，如果我們知道當日『三十五十家方爲一戶』(註一一八)的事實，便不會覺得驚奇了。這許多人口或家數所以要隱蔽于一戶之下，其主要目的爲減輕租稅的負担，對于政府實是一種很大的損失。因此，跟着均田法施行之後，到了太和十年，由於給事中李冲的建議，政府便創立三長制，卽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以便檢察一戶蔭蔽大量人口或家數的流弊(註一一九)。每戶的人口或家數既然減少，政府遂重新規定一夫一婦及奴婢耕牛等應納的租調。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云：

> 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爲降。

其後，到了孝昌二年(526—7)冬，除却戶調中的租粟外，政府又按畝數的多少，徵收京師附近的田租。通典卷五云：

(註一一四)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
(註一一五)魏書卷七上高祖紀。
(註一一六)魏書卷四四薛野賭傳附虎子傳。
(註一一七)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
(註一一八)魏書卷五三李冲傳。
(註一一九)魏書卷五三李冲傳，卷一一〇食貨志。

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註一二〇)。

至於戶調中應納的布帛，在天平年間(534—8)，『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匹，徵錢三百。人庶苦之。(房)謨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註一二一)。由此可知，河南數州人民曾一度以錢幣代替布帛來繳納戶調，但卒因『人庶苦之』而改爲『錢絹兩受，任人所樂』。這件事實給予我們以當日實物租稅盛行的證明。

除上述的田租與戶調外，當日其他稅收也多以實物繳納，雖然實物的種類不見得相同。如魏書卷三太宗紀說從事畜牧的六部民輸納牛馬作調云：

(泰常)六年(421)……二月，調民二十戶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三月……乙亥，制，『六部民羊滿百口，輸(食貨志作調)戎馬一匹』(註一二二)。

又如魏書卷二五長孫道生傳附稚傳說當日鹽稅以絹繳交云：

(肅宗)時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曰，『……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匹也。……』

北魏以後，北齊及北周的租稅仍舊以繳納綿、絹、絲、布、麻及粟等實物爲主，雖然在數量上與北魏略有不同；同時對於徭役的提供也有明文規定。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云：

至河清三年(564—5)定令。……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

這是北齊方面的情形。至於北周，則自周太祖宇文泰于西魏作相時卽已規定：

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一斤；丁者又半之。

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

(註一二〇)魏書卷九肅宗紀，卷一一〇食貨志略同。

(註一二一)北史卷五五房謨傳。

(註一二二)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略同。

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註一二三)。

總之，北朝人民對政府的義務，除力役的提供外，無論戶調、田租、鹽稅或其他賦稅，均以繳納實物爲主。

(三)南朝的實物租稅

南朝的租稅，大部份固然仍以實物繳納，但因錢幣流通的比較發達，貨幣租稅在當日亦漸露頭角。

南朝政府徵收的第一種實物租稅爲田租。田租自東晉以來，規定以米繳納。到了劉宋，孝武帝于大明七年(463)十一月規定『聽受雜物當租』(註一二四)。及南齊，人民仍以米及其他實物輸租。如南史卷七二何思澄傳說：

> 父敬叔，齊長城(在今浙江長興縣東)令。……不受禮遺。夏節至，忽牓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

在青州，又有『麥租』(註一二五)，顧名思義，當然是以麥繳納的田租。往後，到了陳太建九年(577)五月，陳宣帝詔『六年七年逋租田米粟，……皆悉原之』(註一二六)。可見陳的田租也是以米粟等農產品繳納的。

南朝的第二種實物租稅爲戶調。在劉宋大明三年(459—460)，『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註一二七)，可見這時戶調多以綿絹繳納。其後，到了大明五年(462)十二月，孝武帝制，『天下民戶歲輸布四匹』(註一二八)，此後戶調遂多以布繳納。再往後，陳宣帝在太建九年五月丙子詔中，有『夏調綿、絹、絲、石麥等』的話(註一二九)。可見南朝的戶調大體上是以布帛繳納的。

此外，始興郡大田武吏大約因爲佃種官田，也得按丁輸不少的米。宋書卷九二徐豁傳說：

(註一二三)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註一二四)宋書卷六孝武帝紀。

(註一二五)南齊書卷六明帝紀建武二年三月丙寅條。

(註一二六)陳書卷五宣帝紀。

(註一二七)宋書卷八二沈懷文傳。

(註一二八)宋書卷六孝武帝紀。

(註一二九)陳書卷五宣帝紀。

元嘉初，爲始興太守。三年，……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

而向蠻俚課徵的租稅，更是全以各種寶物爲主。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云：

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賧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于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

此外，又有徵收農產品的。如宋書卷九七蠻傳說，『蠻民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而梁書卷一七張齊傳也說，『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斛。』

南朝的租稅，除如上述徵收布帛米粟等物外，又有以錢幣繳納的。宋孝武帝于大明五年十二月規定天下民戶歲輸四匹的布，到了南齊永明四年(486—7)，規定一部份改以錢繳納。南齊書卷三武帝紀載永明四年

五月癸巳，詔，『揚、南徐二州今年戶租三分，二分取見布，一分取錢(註一三〇)。來歲以後，遠近諸州輸錢處，竝減布直，匹准四百，依舊折半，以爲永制。』

復次，按貲（資產）課徵的資產稅，也多以錢繳納。宋書卷八二周朗傳說：

世祖（孝武帝）卽位(454)，……朗上書曰，『……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

此外，南朝的口錢(註一三一)與交易稅(註一三二)，也以錢繳納。

可是，現在雖然沒有可靠的統計數字，我們對于錢幣在南朝政府總收入中的百分比，却不能過份誇張。第一，南齊政府把每戶輸納的布之一部份改徵現錢，結果

(註一三〇)南齊書卷四〇竟陵王子良傳作『詔折租布二分取錢』，與此文異，待考。

(註一三一)如梁書卷二武帝紀載天監元年(502)四月詔云，『逋布、口錢、宿債勿復收。』

(註一三二)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云，『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

流弊百出，人民至感痛苦。如南齊書卷二六王敬則傳云：

> 竟陵王子良啓曰，『……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丁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剪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于所貿。鞭捶質繫，益致無聊。……』

又同書卷四〇竟陵王子良傳云：

> 子良又啓曰，『……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捶革相繼。尋完者爲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曾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

可見當日以錢幣納稅的先決條件——貨幣經濟——雖然已經萌芽，但還沒有十分成熟。復次，按貲計算的資產稅，劉宋時固然已有『田進一畝，度以爲錢』的事，但直到陳代，還有『貲絹』(註一三三)的名稱，可見南朝按貲課徵的資產稅，仍以絹繳納爲多。至於口錢，顧名思義，當然是以錢繳納的了；但南齊建元二年(480—1)，却『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註一三四)。而建元初，因軍用殷廣而以每人一千文的稅率向浙東徵收的丁稅，更是弄到『賣妻賣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尙多，收上事絕。臣等具啓聞，卽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自弊國』(註一三五)。此外，南朝的交易稅固然以錢繳納，但當日錢幣既然只流通於沿長江流域各大都市及其附近，則因以錢交易而課徵的稅錢，數量想也不會很多。

總之，南朝政府的收入，由于錢幣使用的比較發達，已不盡如同時間的北朝國庫那樣完全充滿布帛穀粟等物，而且包括了不少的錢幣，固然是事實；可是，這些錢幣在政府總收入中所佔的百分比，遠不及實物那麼大，同樣的也是很可能的事實。

(四)隋唐時代的實物租稅與徭役

承繼着曹魏以來三百多年的實物租稅制度，隋代的租稅仍以粟及布帛等實物爲

(註一三三)陳書卷五宣帝紀載太建九年五月丙子詔云，『五年迄七年逋貲絹，皆悉原之。』

(註一三四)南齊書卷二二豫章文獻王傳。

(註一三五)南齊書卷二二王敬則傳。

主。計『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此外，年十八已上成丁男女，又須提供徭役（註一三六）。

隋代以後，便到唐代。這時中國租稅制度發生一個很大的變動，卽由曹魏以來按戶課徵的戶調與田租，變爲按丁徵收的租庸調。可是，不管租稅負担者是戶或是丁，其爲徵收粟帛等實物及徭役，則前後並沒有根本上的差別。唐會要卷八三云：

> （武德）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始定均田賦稅。……每丁歲入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觔。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註一三七）。

此外，唐代政府又按畝數的多少來徵收地稅（註一三八），按資產的貧富來徵收戶稅（又作『稅錢』，或『稅戶』）（註一三九）。前者以農產品繳納；後者以錢繳納。關於這幾種租稅在安史亂前政府總收入中所佔的地位，通典卷六有綜括的敍述：

> 天寶中（册府元龜作『八載』），天下計帳戶約有八百九十餘萬：其稅錢約得二百餘萬貫，其地稅約得千二百四十餘萬石。課丁八百二十餘萬，其庸調租等：約出絲綿郡縣計三百七十餘萬丁，庸調輸絹約七百四十餘萬匹，綿則百八十五萬餘屯，租粟則七百四十餘萬石；約出布郡縣計四百五十餘萬丁，庸調輸布約千三十五萬餘端，其租約百九十餘萬丁，江南郡縣，折納布約五百七十餘萬端，二百六十餘萬丁，江北郡縣，納粟約五百二十餘萬石。大凡都計租稅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五千二百二（元龜作『三』）十餘萬端疋屯貫石（註一四〇）。

茲爲眉目清醒計，改列表如下：

（註一三六）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註一三七）册府元龜卷五〇四，四八七，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略同。

（註一三八）關於地稅，鞠清遠先生論證頗詳，見鞠先生唐代財政史第一一至一七頁。

（註一三九）鞠著唐代財政史第七至一一頁。

（註一四〇）册府元龜卷四八七略同。

負擔者	稅名	錢或物名	數量	單位
全國各戶	戶稅	錢	2,000,000+	貫
同上	地稅	農產物	12,400,000+	石
出絲綿郡縣之丁	庸調	絹	7,400,000+	疋
同上	同上	綿	1,850,000+	屯
同上	租	粟	7,400,000+	石
出布郡縣之丁	庸調	布	10,350,000+	端
江南郡縣之丁	租	布	5,700,000+	端
江北郡縣之丁	租	粟	5,200,000+	石
合計			52,300,000+	

這個表給我們一個深刻的印象，即：在安史亂前唐代政府租稅的總收入中，以租庸調及地稅所徵收的絹布綿粟等實物佔絕大多數，戶稅所收的錢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自然，戶稅的錢在當日總稅收中究竟確佔幾分之幾，我們在上表中無從算出；可是，通典在另一地方（卷七）却告訴我們：

> 舊制：百姓供公上，計丁定庸調及稅。其稅戶雖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

由此可知，戶稅的錢在當日政府的總收入中，只佔二三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三點三至百分之五左右而已。如果拿牠來與總稅收中的實物相比，簡直少得可憐！

（五）總結

總括上文，可知中國賦役制度自曹魏以來曾經發生一個很大的變動，即：除租稅的負担者由丁改爲戶外，在漢代多以錢幣繳納的租稅，自曹魏起一變而爲完全以綿絹粟等實物繳納的戶調與田租；而在漢代可拿錢來免除的徭役，自魏晉後也改由人民直接提供。從此以後，中古各朝代的賦役制度雖然屢有變遷，但其徵收穀粟布帛與力役，在根本上幷沒有差別。而且，不僅是戶調與田租，就是鹽稅，在北魏時也是以實物繳納的。自然，南朝因錢幣流通的比較發達，或者要有些例外。不過從大體上看，南朝政府的稅收恐怕還是以實物爲大宗。這一點，雖然由於稅收數字的缺乏，使作者不敢肯定的下一斷語；但由錢幣在安史亂前政府總收入中只佔百分之

三點三至百分之五一事來推論，作者總覺得上述的觀察不會距離事實太遠。

第四章　中古的實物地租

上述中古盛行的實物租稅的一部份，一方面固然是租稅，他方面又可說是地租(rent)。比方由北魏至唐代，政府因實行均田制度——以國家土地分給人民耕種——而向人民徵收的實物田租，從政治的觀點上看，固然是租稅的一種；但如果從經濟的觀點上看，國家實是地主，人民實是佃戶，故人民給與國家的田租也實在就是佃戶給與地主的地租。復次，政府本身又直接保有不少的田地，而於給人佃種時收取地租。如上引宋書卷九二徐豁傳曾說始興『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又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說，『孝昌二年，……借賃公田者，畝一斗。』這種因租借官田而繳納的穀米，當然是一種實物地租。

以上是政府以地主資格徵收的實物地租。復次，私人方面如果把土地租給人家耕種，也可得到實物地租作爲代價。這在均田制沒有實行的東晉南朝尤爲盛行。如隋書卷二四食貨志說自東晉起建業人民多充當王公貴人們的佃客，即租借他們的田地來耕種，而以收穫的穀之一部給與他們作爲地租云：

> 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十戶，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

到了唐代，官吏的收入除俸祿外又有職田。這些職田由農民租來耕種，而以田地產品的一部份送給官吏，作爲地租的報酬。如册府元龜卷五〇六云：

> (開元)十九年四月，敕，『天下諸州縣幷府鎮戍官等職田四至頃畝，造帳申省，仍依元租價對定。六斗已下者，依舊定；以上者，不得過六斗。』(註一四一)。
>
> (天寶)十二載十月，敕，『兩京百官職田，承前佃人自送，道路或遠，勞

(註一四一)唐會要卷九二、新唐書卷五五食貨志略同，但文句不及册府元龜那麼清楚。

費頗多。自今已後，其職田去城五十里內者，依舊令佃人自送入城；自餘並限十月內，便於所管縣幷脚價貯納。其脚價，五十里外每斗各徵二文，一百里外不得過三文。並令百官差本司人請受。』(註一四二)

又通典卷三五職田公廨田云：

其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多受數而已。

這種用來繳納職田田租的物品，因田而異，大約以粟和米爲多。在唐初，政府曾經規定，『凡給田而無地者，畝給粟二斗』(註一四三)。政府所以拿兩斗粟代替一畝職田來給予官吏，當是因爲官吏每年從一畝職田中得到的地租爲兩斗粟的原故。又資治通鑑卷二三八載李吉甫的話云：

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三十千，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註一四四)。

這裏說的千斛的米，一部份固然屬於祿米，一部份則爲職田的田租。

除上述外，我們又可根據敦煌寫本來探討西北人士以實物繳納地租的情形。倫敦英國博物院藏 Stein 搜集品第六〇六三號是一張租田契，內說燉煌鄉索里奴等以每畝一石二升的代價租借七畝田地來耕種：

乙亥年二月十六日，燉煌鄉百姓索里奴□子二人，伏緣欠闕田地，遂（？）於□易□□護□上，於城東憂渠中界地柒畝，遂粗（租）種苗（苗）。其地斷作價直，每畝壹碩二升，不諫（揀）諸雜色目，並惣收納。共兩（兩共）面對□□□午。立契已後，更不許休悔。如若□□□□□□駒，充入不悔人。恐人無信，故立此契。粗（租）地人程□□。粗（租）地人索里奴。見人氾海保(註一四五)。

這裏說當作地租來繳納的東西，雖然聲明『不揀諸雜色目，並惣收納』，但既然以升斗計算，當卽指粮食類物品而言。

總之，關於中古地租的材料，作者雖然沒有搜集到多少，但由上所述，我們已

(註一四二)唐會要卷九二，新唐書卷五五食貨志略同。

(註一四三)新唐書卷五五食貨志。

(註一四四)唐會要卷九一，册府元龜卷五〇七略同。

(註一四五)見玉井是博支那西陲出土的契，日本京城帝國大學創立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史學篇。

經可以知道：當日的土地，不管其所有者是國家或是私人，當被農民租賃來耕種的時候，農民酬給地主的地租完全是農產品一類的實物，而不是錢幣。由此可見中古各地實物地租的盛行。

第五章　中古的實物工資

（一）魏晉時代的實物工資

所謂『工資』，廣義說來，不單是勞動者的工資，而且包括官吏的薪俸，和自由職業者的收入。作者在這裏討論的中古工資制度，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

中國的工資制度，有如上述的貨幣、租稅及地租那樣，從漢末以後發生一個激劇的變動。在漢代，政府給予官吏的薪俸，一半以錢幣支付。這種一半以錢幣發給的官俸制度，自漢末以後，完全改變。當日因爲錢幣的缺乏，政府不復能夠以錢幣發給官吏的薪俸，只好完全以穀帛等實物來支付。如魏志卷二五高常隆傳載高常隆上疏云：

> 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

又前引魏志卷二七胡質傳注引晉陽秋亦有以絹作官俸的記事：

> （胡）質之爲荆州也，威自京都省之。……臨辭，質賜其絹一疋，爲道路粮。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故俸之餘，故以爲汝粮耳。』

曹魏這種以實物支付薪俸的辦法，給中古各朝代的薪俸制度以一個很大的影響。

晉承曹魏之後，實物薪俸制度衍變得更爲精密。當日官吏的收入，除如曹魏那樣得到布帛及農產品以外，又從政府那裏領到菜田和耕種菜田的工人。晉書卷二四職官志云：

>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太康二年(281—2)，又給絹，春百匹，秋絹二百匹，緜二百斤。元康元年(291—2)，給菜田十頃，騶十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
>
> 特進，……食奉日四斛。太康二年，始賜春服絹五十匹，秋絹百五十匹，緜一百五十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八頃，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

年。

光祿大夫……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緜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

三品將軍……食奉，春秋賜緜絹，菜田，田騶，如光祿大夫諸卿制置。

尙書令……食奉月五十斛。……太康二年，始給賜絹，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緜七十斤。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太子太傅、少傅，……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緜百斤。……惠帝元康元年，……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

諸侯的俸祿，亦以絹、穀等實物來支付。初學記卷二七云：

晉故事：……凡屬諸侯，皆減租穀，畝一斗；計所減以增諸侯絹，戶一匹，以其絹爲諸侯秩。又分民租，戶二斛，以爲侯奉。

至於軍人的廩給，卽軍餉，亦以布支付。如晉書卷六二祖逖傳云：

（元）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

上述晉代的實物工資，偏於官吏方面。復次，當日自由職業者因爲人服務而領得的工資，也以各種實物爲主。如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引王隱晉書說以絹支付寫作家的工資云：

劉實爲伐蜀人作爭功文書，得千疋絹。

又同書卷六一一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說以柴菜等物支付書記的工資云：

豫州刺史張悕……幼而好學，事母以孝聞。每日必于牧暇採樵二束，菜二本，一以供母，一以雇人書。晝則折木葉學書，夜則誦所書者。

又同書卷八一七引晉陽秋說以錢絹支付星人的工資云：

桓溫入蜀，聞有善星人，招致之，獨執其手于星下，問國祚修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決無憂虞，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送絹一匹，錢五千與之。

又劉宋劉敬叔異苑卷九說以粟支付卜者的工資云：

北海任詡，字彥期，從軍十年乃歸。臨還，握粟出卜。師云，……(註一四六)

總之，魏晉時代，由於錢幣的缺乏，人們無論在政界服務，或充當自由職業者，其工資所得均以布帛及農產品等實物爲主，錢幣則少之又少。上述星人因替桓溫觀星而得的五千錢，只是絕無而僅有的一個例子，我們不能因此而得出晉代貨幣工資盛行的結論。

(二)北朝的實物工資

北魏在太和八年(484—5)以前，官吏沒有正式的薪俸。他們服務時的收入，約有兩種來源：第一爲接受人民贈送的禮物；第二爲派遣商人販運貨物以取利。這可以弘農(今河南陝縣)太守崔寬爲例。魏書卷二四崔玄伯傳附寬傳云：

> 出爲弘農太守。……時官無祿力，唯取給於民。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又弘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販貿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鎭之中，號爲能政。

當日官吏這種收受體物及經營商業的風氣，在政治上自然要發生很壞的影響。爲着要免除這種政治上的積弊，賢明的執政者高祖孝文帝便於太和八年六月開始大大的加以改革：他一方面增加人民以布帛穀粟繳納的戶調，以便用來發給官吏的俸祿；他方面又嚴禁官吏貪贓，及利用商人販運以取利。魏書卷七上高祖紀載太和八年

> 六月丁卯，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尙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先朝因循，未遑釐改。朕永鑒四方，求民之瘼，夙興昧旦，至於憂勤；故憲章舊典，始班俸祿，罷諸商人，以簡民事。戶增調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爲官司之祿。……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

又同書卷一一〇食貨志亦說：

> 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

由此可知，自太和八年高祖孝文帝班祿以後，北魏官吏服務所得的薪俸，由人民的

(註一四六)異苑作者劉敬叔爲劉宋初年人，書中多記晉宋間事，故此事雖無年月，其必發生於晉宋間可無疑義。

禮物及經商的利潤一變而爲布帛穀粟等實物。這種以實物支付官俸的辦法，到了太和十九年(405—6)略有改變。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說：

（太和）十九年，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鎭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準絹給錢，匹爲錢二百。

不過準絹給錢的辦法，却有如同一詔中規定『京師及諸州鎭皆通行之』的沒有澈底實行(註一四七)那樣，事實上幷沒有澈底實行。因爲北魏政府雖然自太和十九年起已經開始鑄錢，錢的數量却非常有限(註一四八)，故政府因支付內外百官祿而能夠拿來準絹發給的錢實在少之又少。因此，從太和十九年以後，官吏的薪俸仍多以布帛等實物來支付。魏書卷七一夏侯道遷傳云：

（世宗時，500—515）尋改封濮陽縣開國侯，……國秩歲入三千餘疋，……

又同書卷七八張普惠傳載肅宗時(516—528)張普惠上疏云：

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幷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以亂視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

除粟帛等外，當日官吏又可領到公田，有如晉代官吏的領到菜田那樣。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云：

（太和）九年，下詔：……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以上都是北魏政府以實物支付官吏薪俸的情形。復次，當日從事政界以外的職業的人因服務而得的工資，也以實物爲主。如魏書卷一九上陽平王新成傳附衍傳說徐謇（字成伯）因給人治病，得絹作診金的報酬云：

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勑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其爲帝所重如此。

這位醫生又曾經把高祖孝文帝的病治好，孝文帝給他的報酬更多；這種報酬起初打算以錢支付，後來卻因錢少而改給奴、婢、馬、牛和其他各種物品。魏書卷九一徐

(註一四七)參考第二章第四節。

(註一四八)同上。

謇傳云：

（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幸懸瓠，其疾大漸。乃馳驛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內外稱慶。……乃下詔曰，『……徐成伯……可……賜錢一萬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一千匹，雜物一百匹，四十匹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一匹出驊騮，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皆經內呈。

除醫生療病所得外，其他自由職業者的收入亦多爲布帛等實物。如魏書卷五五劉芳傳說劉芳以每卷一縑的工資率爲諸僧抄寫經論云：

芳……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跡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

又魏書卷七二賈思伯傳說賈思伯把縑送給他的老師，以作歸還舊欠學費之用云：

世宗卽位，……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賃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時人稱歎焉。

除公務員及自由職業者以外，北魏勞動者的工資也以實物支付。如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說以絹支付造船工匠的工資云：

三門都將薛欽上言，『……今求車取雇絹三匹，……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幷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

又第二章第四節曾引魏書卷四〇陸俟傳附馥傳說以布帛築造佛寺；這些布帛的一部份是用來支付造寺工人的工資的。此外又曾引魏書卷六一畢衆敬傳，卷八三上外戚傳馮熙條，卷八七石祖興傳，卷九〇逸士傳馮亮條，及卷九四閹官傳抱嶷條與孟鸞條，以證明布帛被用來支付喪葬費用；這些布帛的一部份亦以工資的形式給予從事喪葬工作的勞動者。

以上都是北魏人士以實物支付工資的情形。北魏以後，北齊及北周的政府也繼續採用以實物支付官俸的辦法。北周官吏的俸祿，和前代一樣，以石數計算。北齊計算官吏俸祿的辦法，更爲特別，是以布帛的匹數計算的；不過當作俸祿來支付的物品，都是『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此外，這些官吏又如北魏那樣領

公到田，以收取實物地租(註一四九)。

由上述，可知北朝因爲錢幣流通量的稀少，實物工資非常盛行。在北魏，無論是公務員，自由職業者，或是勞動者，他們服務所得的報酬，均以實物爲主。以後的北齊及北周，也沒有多大的改變。固然，北齊官吏的俸祿，有三分之一是以錢支付的；但粟帛等實物在當日官吏的俸祿中還是佔大部份。

（三）南朝的實物工資

關于南朝的工資制度，我們現在知道得比較詳細的，只是官吏俸祿方面。南朝官吏因服務而得的報酬，也以實物爲主。南齊書卷二二豫章文獻王傳云：

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註一五〇)。

這些用來支付公務員薪俸的實物，也多半爲布帛穀米。宋書卷九後廢帝紀載元徽四年(476)五月

乙未，尚書右丞虞玩之表陳時事曰，『……其穀帛所入，折供文武。……』

又同書卷九一孝義傳何子平條說：

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

又南史卷五七范雲傳云：

再遷零陵內史。初零陵舊政，公田奉米之外，別雜調四千石。及雲至郡，止其半，百姓悅之。深爲齊明帝所知。

這是宋齊間的情形。其後，梁陳的官俸亦以石數計算(註一五一)，而發給米及布帛等物。如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云：

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別（通典作『例』）唯得稟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倉庫(註一五二)。

(註一四九)均見隋書卷二六百官志，及通典卷三五。

(註一五〇)通典卷三五略同。

(註一五一)隋書卷二六百官志通典三五。

(註一五二)通典卷五及三九略同。

南朝的官吏，除如上述得到穀帛等俸物外，又從政府那裏領到公田和侍役。關于公田，上引宋書卷九一孝義傳何子平條已有記載；復次，通典卷三五亦云：

（宋）武帝初卽位，制，『凡中二千石，加公田一頃。』

其郡縣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者，悉入後人。元嘉末，又改此制，計月分祿。

至于侍役。南齊書卷三武帝紀載永明七年(489)正月

戊辰，詔曰，『諸大夫年秩隆重，祿力殊薄。豈所謂下車惟舊，趨橋敬老？可增俸，詳給具役。』

又通典卷三五云：

齊氏衆官有僮幹之役，而不詳其制。

註云：

幹者，若門僕之類也。

南齊一小部份的官員，自永元元年（499）起，其薪俸由實物改爲錢幣。南齊書卷七東昏侯紀載永元元年正月辛卯，

詔，『三（通典卷三五作二）品清資官以上應食祿者，有二親或祖父母年登七十，竝給見錢。』

其後，梁武帝更規定一切官吏薪俸改以見錢發給。梁書卷三武帝紀載大通元年(527)正月乙丑，

詔曰，『……百官俸祿，本有定數。前代以來，皆多評准。頃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已後，可長給見錢。依時卽出，勿令逋緩。……』

不過這個詔令究竟實行到什麼程度，卻大有問題，因爲據上引隋書食貨志，梁代自武帝晚年侯景之亂（548）以後，京官因收入少而遙帶一郡縣官所得的俸祿，也只是米、絹、布、絲、綿等實物，而不是錢幣。而且，就是上述詔令曾經短期間實行過，官吏薪俸所得，也不是良好的錢幣，只是劣質的鐵錢而已；因爲梁武帝在普通年間(520—7)卽已盡罷銅錢，改鑄鐵錢了（註一五三）。

除上述公務員的薪俸外，南朝勞動者的工資也有以布帛支付的。如南齊書卷四

（註一五三）參考第二章第五節。

一張融傳云：

（宋）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襯錢帛，……

這些錢帛的一部份以工資的形式發給建造佛寺的工人。

總之，南朝人士因服務而得的工資，大都以穀帛等實物爲主。此外，官吏又可從政府那裏領到公田和侍役。固然，當日公務員的薪俸，和勞動者的工資，有一部份是以錢幣支付的；不過，就大體上看，南朝人士因服務而得的工資，還是以實物爲主，錢幣只是其中一小部份而已。

（四）隋代的實物工資

隋代實物工資的制度也很盛行。當日各級官吏的俸祿，均以石數的多少計算（註一五四）。其後，到了隋末義甯二年(618)，『唐高祖初爲相國，罷外官給祿，每十斛給地二十畝』（註一五五）。此外，隋文帝又給公卿以下內外官以職分田（註一五六）。

除公務員的薪俸外，隋代自由職業者的收入，也以實物爲主。如太平廣記卷一九一高開道引獨異志（註一五七）說某醫生因用手術爲人治病而得絹甚多云：

> 隋末高開道被箭鏃入骨，命一醫工拔之。不得。……更命一醫。云，『我能拔之。』以一小斧子當刺下瘡際，用小棒打入骨一寸，以鉗拔之。開道飲啗自若，賜醫工絹三百匹。

又唐袁郊甘澤謠魏先生條說音樂家魏某因給人講授樂理而得帛作酬勞云：

> 魏先生生于周，家于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遊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蘇夔蔡子元等詳其樂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爲大樂。官歛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酒爲娛。

此外，隋代勞動者因工作而得的報酬，也以實物爲多。如唐唐臨冥報記（涵芬樓祕笈第六集）卷上說釋智苑以絹及錢物支付製造石經工匠的工資云：

(註一五四)隋書卷二八百官志，通典卷三五。

(註一五五)册府元龜卷五〇五，通典卷三五。

(註一五六)通典卷三五。

(註一五七)今傳獨異志有稗海本，但不載此事。

幽州沙門釋智蒐，精練有學識。隋（原誤作『隨』，茲改正。下同。）大業中，發心造石經藏之，以備法滅。既而于幽州北山鑿巖爲石室，乃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乃以石塞門，用鐵鋼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役蕭瑀，皇后之同母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餘錢物，以助成之。瑀亦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蒐得遂其功。蒐嘗以役匠既多，道俗奔湊，……蒐所造石滿七室。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猶繼其功。

由上述，可知隋代的人士，無論是公務員，自由職業者，或是勞動者，其服務所得的工資，完全以實物爲主。

（五）唐代的實物工資

由唐初至安史之亂左右，人們因工作而得的報酬，也多爲實物。茲就當日公務員的薪俸，自由職業者的收入，及勞動者的工資，分別敍述如下。

唐代官吏的俸祿，約可分爲三項：(1) 祿，(2) 職田，(3) 俸料錢（註一五八）。祿按官吏等級的高下，分別以粟或米發給，『無粟則以鹽爲祿』（註一五九）。官吏因領到職田而每年收得的田租，據第四章所述，也以粟或米等實物爲主。至於俸料錢，包括月俸及食料錢兩種收入，原則上是以錢幣支付的；不過事實上政府卻沒有完全支付錢幣，多半按照時價折成物品來發給，故稱曰俸物。如唐會要卷九一內外官料錢云：

長壽三年 (694) 三月，豆盧欽望請輟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物，以助軍。……（開元）十六年 (728) 十一月十五日，敕，『文武百官俸料錢所給物，宜依時價給。』（註一六〇）

這些當作俸料錢來發給的物品，大約以布帛爲多，故舊唐書卷九八魏知古傳云：

景雲二年(711—2)，遷右散騎常侍。……又進諫曰，『……今……官員日增。

（註一五八）宋王溥於唐會要中敍述唐代官吏的薪俸，分爲(1)內外官祿（卷九〇），(2)內外官料錢（卷九一，九二）及(3)內外官職田（九二）三項，最爲清楚。

（註一五九）新唐書卷五五食貨志。

（註一六〇）册府元龜卷五〇六同。

今諸司試及員外檢校等官，僅至二千餘人，太府之布帛以殫，太倉之米粟難給。……』

因此，當高宗乾封元年(666—7)左右，政府每歲發給中央官吏的俸料錢，據通典卷三五所載，一共不過一十五萬三千七百二十貫(註一六一)而已。總之，唐人在安史亂前因在政界服務而得的薪俸，以實物爲主，錢幣則只佔絕小部份，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除公務員外，中唐以前自由職業者的收入，也以布帛等實物爲主。關於此點，記載較多，茲分別敍述如下：

(1) 醫生——如唐薛用弱集異記說某人以絹聘請醫生爲他的兒子治病云：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656—661)，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闐鄉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

又唐李冗獨異志卷上說某醫生爲高宗治疾，得繒帛作酬勞云：

唐高宗嘗苦頭風，而目閉心亂，乃召醫工。工曰，『當於眉間刺血，卽差。』……遂針之，血出濺黼衣，眼遂明，而悉復平。天后自抱繒帛以贈醫工。

(2) 卜者——如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三說某將軍以細綾作卜者的工資云：

崇仁方(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塡門。浮休子張鷟(註一六二)曾往觀之。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疋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將軍頂禮。旣告請甚多，必望細看以決疑惑，遂卽隨意支配。

又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五說術士錢知微以一卦帛十疋的工資率爲人占卦云：

天寶末(755)，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著布卦成，曰……其精如此！

又唐鍾輅前定錄說李揆以縑求卜云：

(註一六一)冊府元龜卷五〇五作『十五萬二千七百二十貫』，系於乾封元年八月條下；新唐書卷五五食貨志則作『十五萬二千七百三十緡』：數目均與通典略有不同。

(註一六二)玄宗時人，見舊唐書卷一三五張荐傳。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京師(註一六三)，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一道尉。』……

又太平廣記卷三八五柳少遊引廣異記說柳少遊賣卜得縑云：

柳少遊善卜筮。著名于京師。天寶中(742—755)，有客持一縑詣少遊。引入問故。答曰，『願知年命。』少遊爲作卦成，……

又同書卷二一七潁陰日者引定命錄說陳澍以官絹酬卜者云：

陳澍爲潁陰太守，屬安祿山反(755)，……澍憂悶，服痢藥託疾，令一日者卜之。……以官絹五匹賞卜者。

(3) 相者——如唐康駢劇談錄卷上說李晟攜絹訪桑道茂，請代爲看相云：

李司徒嘗于左廣効職，久未遷昇，聞桑道茂善相人，賫絹一匹，凌晨而往。時道茂……聞李公在門，親自迎接，……(註一六四)

(4) 畫家——如獨異志卷上說韓幹爲人畫馬，得絹作酬勞云：

唐韓幹(註一六五)善畫馬。閒居之際，忽有一人玄冠朱衣而至。幹問曰，『何緣及此？』對曰，『……聞君善畫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謝曰(註一六六)，『蒙君惠駿足，……亦有以酬効。』明(註一六六)日，有人送縑百匹，不知其來。幹亦收用之。

(5) 教師——如第二章第七節引冥報記卷下說唐初嘉運在蜀『爲人講書，得絹數十匹』，便是例證。

(6) 刺客——如唐劉肅大唐新語(稗海本)卷四說崔宣家人擬以絹僱刺客殺仇人云：

則天朝，或告駙馬崔宣謀反。　宣再從第思競……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

(註一六三)李揆於開元末年(741)舉進士，見舊唐書卷一二六李揆傳。

(註一六四)按李晟於德宗初年任討朱泚的統帥。由此推算他因未得志而請人看相事，約發生於肅代間(756—779)。

(註一六五)韓幹爲開元天寶間(713—755)畫家，見太平廣記卷二一一韓幹引唐畫斷。

(註一六六)稗海本獨異志缺此二字，茲據太平廣記卷二一一韓幹引獨異志補入。

謂甯素同（廣記作『宣妻曰』），『須絹三百匹，顧刺客殺此告者。』……（註一六七）

此外，中唐以前的勞動者，其服務所得的工資，也多爲布帛等物。當日勞動者每天勞作聽到的工資，大約爲三尺絹左右。唐律疏議卷四云：

平功庸者，計一人一日爲絹三尺。

計功作庸應得罪者，計一人一日爲絹三尺。

又同書卷一一云：

其借使人功，計庸一日絹三尺。

這是就一般勞動者說的。至于各業勞動工人聽得的工資，也以布帛爲多。如太平廣記卷一三四王珍引廣古今五行記說金銀作工匠王珍等因與寺家造功德而得絹五百疋云：

唐定州安嘉縣人王珍，能金銀作。曾與寺家造功德，得絹五百匹。同作人私費十匹，王珍不知。……珍以咸亨五年（674）入海，……

又同書卷三〇〇三衞引廣異記說三衞因代人寄信，得絹二疋云：

開元初（713），有三衞自京還青州，至華嶽廟前，……遇見一婦人，年十六七，容色慘悴，曰，『……聞君遠還，欲以尺書遠累。若能爲達家君，當有大報。』遂以書付之。……及至北海，如言送書。……大王（婦人之父）……乃謂三衞曰，『無以上報。』命左右取絹二匹贈使者。三衞不說，心怨二匹之少也。

又第二章第七節曾引新唐書卷二二〇高麗傳說太宗時以縑一千二百匹造船一艘。這些縑的一部份是用來支付造船工匠的工資的。

由此可知，中唐以前的公務員，自由職業者，以及勞動者，其工作聽得的工資，也以實物爲多。

（六）從敦煌寫本中所見的實物工資

關于中古以實物支付工資的制度，除散見於上述各史籍及筆記外，我們又可根據敦煌寫本來探討當日西北實物工資盛行的情況。

（註一六七）太平廣記卷四九四崔思競引大唐新語略同。

在敦煌寫本中，我們可以見出當日西北人以布帛支付工資的情形。如水部式（鳴沙石室佚書）說晉絳兩州勳官因充勝州（故城在今綏遠鄂爾多斯左翼後旗黃河西岸）轉運水手而得絹布作酬勞云。

> 勝州轉運水手一百廿人，均出晉絳兩州，取勳官充。……其勳官每年賜勳一轉，賜絹三疋，布三端，以當州應入京錢物充。

又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敦煌寫本成字第九十六號目蓮變文第三種背面爲僧人唱曲賬目（註一六八），其中詳記寺院僧人因演唱變文小曲而得的布的長短，及把這些布分別支付給僧人的情形：

> 法律德榮唱紫羅鞋雨，得布伍佰捌拾尺。支本分一百五十尺。支定眞一百五十尺。支政會一百五十尺。支圖福盈一百五十尺。餘二十尺。
>
> 法律保宣舊律，阡捌百玖拾尺。
>
> 僧政願清唱緋錦綾被，得布壹阡伍佰貳拾尺；舊襯，壹阡尺。支圖海明一百五十尺。支圖願護一百五十尺。支智全一百五十尺。支智榮一百五十尺。支圖福盛一百五十尺。支支（？）圖應求一百五十尺。支圖願德一百五十尺。支圖法興一百五十尺。支圖大應一百五十尺。支圖應祥一百五十尺。支圖應慶一百五十尺。支圖大進一百五十尺。支圖大願一百五十尺。支圖談濟一百五十尺。支圖廣進一百五十尺。
>
> 金剛唱扇，得布伍拾伍尺。支本分一百五十尺。餘九十五尺。
>
> 道成唱白綾襪，得布壹伯柒拾尺。支本分一百五十尺。支普列法一百五十尺。餘一百三十尺。
>
> 道明舊襯，叁佰玖拾尺。
>
> 法律道英唱白綾襪，得布叁佰尺。又唱黃盡坡，得布伍佰尺。支圖道明一百五十尺。支本分一百五十尺。支圖祥定一百五十尺。支圖談宣一百五十尺。支圖談惠一百五十尺。支圖戒云一百五十尺。支□賢惠一百五十尺。支云祥

（註一六八）見向達敦煌叢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五卷第六號。向先生在此文敍錄中說，『北平圖書館藏成字九六號目蓮變文卷背書有僧人在外唱小曲所得賬目，所唱小曲名目有紫羅鞋雨，緋錦綾被，扇，白綾襪之屬。…凡此寺院僧人演唱小曲唱文之屬，其痕跡猶有可見者也。』

通一百五（下闕）

復次，在敦煌寫本中，我們又可看見當日西北人士常常以麥粟等物來支付工資。他們以麥粟支付工資的盛況，甚至遠在以布帛支付工資之上。如敦煌雜錄下輯書幡賬目（鳥字八十四號）說以麥及布、油等支付書幡（註一六九）及書佛堂的工資云：

丑年五月十五日，杜都督當家書幡卅二口，每一口麥壹碩，准合麥肆拾貳碩。

寅年三月廿日，僧海印書幡十二口，每口麥壹碩貳升。

卯年二月十日，僧福漸書幡十二口，每口麥壹碩貳斛。

張山海書幡價，領得物：七宗布一疋，麥兩碩，油一升。

北蘭若杜家書佛堂，領麥陸碩。高行眞得。

又同書下輯僧慈燈與氾英振造佛堂契（鹹字五十九號）說僧慈燈以麥捌碩僱氾英振建造佛堂云：

寅年八月七日，僧慈燈于東河莊造佛堂一所，口無博士，遂共悉東薩部落百姓氾英振口意，造前佛堂，斷作麥捌口碩，其佛堂外面壹丈四尺，一仰氾英振壘，幷細泥一遍。其佛堂，從八月十五日起首。其麥，平章日付布壹匹，折麥肆碩貳斛；又折先付慈燈麥兩碩一斛；餘肆（尙？）欠氾英振壹碩柒斛，畢功日分付。一定已後，不許休悔。如先悔者，罰麥叁馱入不悔人。恐人無信，故立此契，兩共平章，書紙爲記。博士氾英振，年卅二。見人僧海德。

又羅福萇沙州文錄補僧明哲牒說僧明哲借貸麥粟，以作修寺工資及糧食之用云：

金光明寺　狀上

貸便麥拾五馱，粟五馱。

右緣當寺虛無，家客貧弊，寺廟破壞，敢不修營？今現施工，未得成辦（辦），糧食罄盡，工直未填（支？）。只欲休廢，恐木石難存。只欲就修，方圓不遂。旨意成立，力不遂心。伏望　教授都頭倉貸便前件斛斗，自

（註一六九）幡是佛教寺院做功德用的旗幟，其上有文字及圖畫。『書幡』當即在幡上寫繪字畫之意。Sir Aurel Stein, Serindia, vol. IV 中印有敦煌出土的幡（Silk Banners 及 Linen Banners）多張，可以參看。

至秋八月填納。一則寺舍成立；二乃斛斗不虧。二圖事儀，似有穩便。伏望教授商量，請處分。

牒件狀如前。謹牒。丑年五月□□日。直歲明哲謹牒。都維那惠微。寺主金粟。

此外，當日農業工人的僱用，除卻以麥作工資外，又須由主人給予衣着皮鞋等物。敦煌雜錄下輯盧貝跋蹄雇作兒契（生字二十五號）云：

甲戌年正月一日，立契：慈惠鄉百姓盧貝跋蹄伏緣家中欠少人力，龍勒鄉鄧訥兒鉢面上，雇男延受造作。□從正月至九月末，斷作雇價，每月壹馱，春衣壹劄，汗衫壹領，褲襠壹腰，皮鞋壹雨（兩？）。自雇後，便須尅尅造作，不得拋功壹月。忙時拋功壹月，尅物貳斗。閑時拋功一日，尅物斥（？）。若作兒身上使用籠具鎌刀鐸鍱鍬鑼袋器什等，畔上拋扶（失？）打損，棄在作兒身上，不關主人之事；若收到家中，不關作兒之事。若作兒偷他菰、菓、菜、如（魚）、羊、牛等，忽如足（捉）得者，仰在作兒身上。……雨（兩）共面對平章，准格不許番悔。若先悔者，罰青麥拾馱，充入不悔人。恐人無信，故立私契，用爲憑。

又同書下輯文德雇人力約（殷字四十一號）亦云：

癸未年三月廿八月，立契：龍勒羅□□□文德欠闕人力，遂于赤心鄉賀康三雇取。麥□不得□一日，每月來馳（壹馱？），春衣□鞋一□。春衣爲□限□或若車牛籠且（具）鎌刀爲刼牛畜喚他人田種……

按此文殘闕太多，不易解釋。不過細繹文意，我們可以知道：文德雇用爲他耕作的工人，其所給工資爲麥及衣鞋等物。復次，敦煌掇瑣五四吳慶順質身契說吳慶順以身體典質給寺院，以借用麥粟等物云：

癸卯年十月廿八日，慈惠鄉百姓吳慶順兄弟三人商議：爲緣家中貧乏，欠負□深，今將慶順己身典在龍興寺索僧正家，見取麥壹拾碩，黃麻壹碩陸斗，准麥叁碩貳斗，又取粟玖石，更無交加。自取物後，人無雇價，物無利頭，便任索家駈馳，比至還得物日，不許左右。或若到家被惡人拘卷，盜刃他人牛羊蘭菜麥粟，一仰慶順祇當，不干主人之事。……如若主人不在，所有農

遺失，亦仰慶順倍（賠）。……兩共面對商量爲定。恐人無信，故立此契爲後憑。

文中的「人無雇價，物無利頭」，意思是說：寺院索僧正把麥粟貸給吳氏兄弟，答應不索取利息；可是，在借麥粟期內，吳慶順須無償的爲索僧正耕作，不能向他要工資。換句話說，吳氏兄弟所借麥粟的利息，和吳慶順耕作聽得的工資互相抵消去了。吳氏兄弟所借的既然是麥粟等物，他們因此而償付的利息自然也以麥粟爲主。由此可知，吳慶順的工資實際上是拿麥粟來支付的。

總之，我們在敦煌寫本中所見的工資，也是以布帛及麥粟等實物來支付的。固然，在現今作者徵引的敦煌寫本中，因爲完全沒有確實年月的記載，故牠們究竟屬於中唐以前，或中唐以後，作者一時不敢貿然斷定。不過，這些記載如果不屬於中唐以前，便屬於中唐以後，二者必有一於此。如果確屬於中唐以前，那和作者中唐以前實物工資盛行之說正相符合。如果屬於以後，那亦無須驚奇，因爲西北地處邊隅，不能與內地同時受到貨幣經濟這一大潮流的波及，從而在中唐以後實物工資制度仍舊流行，也是很可能的。

（七）總結

總括上文，我們可知中國的工資制度，自漢末以後，到中唐以前，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卽以實物來支付公務員，自由職業者及勞動者因服務而得的工資。這些用來支付工資的實物，有時包括的種類甚多，不過以布帛及米、麥、粟等農產品爲最主要。自然，有時官吏領得的薪俸，有一部份是以錢支付的；不過從大體上看，錢幣在官吏們的收入中實在只佔一小部份，他們大部份的收入還是以布帛、米、粟等實物爲主。

第六章　安史之亂前後自然經濟的衰落與貨幣經濟的興起

（一）概說

由上所述，我們可知中國自漢末以後，至安史之亂的前後，約共五百多年，自然經濟都佔有很雄厚的勢力。在買賣方面，人們多把穀帛等實物當作貨幣來交易，卽物物交換。在租稅方面，政府大部份徵收實物。此外，地租的繳納，和工資的支

付，也多以實物爲主。固然，錢幣有時也用來購買商品，繳納租稅，或支付工資，但牠并沒有普遍而深刻的侵入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有如以後貨幣經濟佔優勢的時代那樣。因此，這五百多年雖然不是純粹的自然經濟時代，我們至少可以稱牠爲自然經濟佔優勢的時代。

這種自漢末以來盛行了五百多年的自然經濟，到了安史之亂的前後(註一七〇)可要漸漸衰微，而讓位於貨幣經濟了(註一七一)。這時自然經濟所以衰落，貨幣經濟所以興起，其主要原因約可分爲兩種。

頭一種原因是商業的發展。中古時奄奄一息的商業，到了安史亂前，或開元天寶間，卽有了轉機。這時候的商業所以能一反過去幾百年衰落的狀況而作大規模的發展，約有三個因素：

(1) 社會秩序的安全 —— 社會秩序的安甯與否，和商業的盛衰有很密切的關係。漢末以後商業所以衰落，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長期的戰亂，已如前述。這種不安甯的社會秩序，到了南朝，似乎要比較進步；可是那時的商人，當販運貨物的時候，還是要攜帶武器來自衛(註一七二)呢！直至開元天寶間，隨着政治上黃金時代的降臨，各地都呈現着昇平盛世的景象；這時候的商旅，就是老遠的到各地販運貨

(註一七〇)作者在這裏要特別聲明：這只是就大體上說的。關於經濟史的分期，我們很難斬釘截鐵般的劃分淸楚，說從某年起自然經濟便完全衰落，以後貨幣經濟卽起而代之；因爲社會經濟的演進，是漸變的，不是突變的。就下述幾種變動而論，也不是同在某年發生，只是差不多都發生於安史之亂的時候，或以前不久，或以後不久而已。

(註一七一)關於自然經濟與貨幣經濟的分別，及由自然經濟演進爲貨幣經濟的特徵，在現代資本主義第一卷第一分册中有簡明的敍述：

貨幣經濟與自然經濟的說法所具的意義只是，前者指一種於應用物品外還有貨幣商品出現的經濟編制，而後者却沒有這種貨幣商品。

又如在領地的組織範圍以內，租稅的繳納改用貨幣，勞動工資的支付不是消費品而是貨幣，關稅的徵收也不是商品而是貨幣，這一切的轉變確是從自然經濟過渡到貨幣經濟，……(第七六頁)

我所指的是納物地租轉變爲貨幣地租，自然物工資轉變爲貨幣工資，自然物關稅轉變爲貨幣關稅，並且推行貨幣賦稅(第七八頁)。

(註一七二)宋書卷六孝武紀大明八年春正月甲戌詔。

物，也不必發愁治安的惡劣，從而不用攜帶什麼武器來作自衛的打算了。如宋王讜唐語林卷三說：

> 開元初，上（唐玄宗）留心理道，革去弊訛。不六七年間，天下大理，河清海晏，……丁壯之夫，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不齎糧。

又通典卷七說：

> 至（開元）十三年，……南詣荆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寸刃。

又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云：

> 其時（開元二十八年）……天下乂安，雖行萬里，不持兵刃。

又資治通鑑卷二一四云：

> 是歲（開元二十八年）……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又宋錢易南部新書辛說：

> 開元二十八年，天下無事，海內雄富。行者雖適萬里，不持寸刃。

又杜甫憶惜詩(註一七三)云：

> 憶昔開元全盛日，……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又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云：

> 是時（天寶五載）海內富實，……行千里不持寸兵。

這當然大有助於商業的發展。

(2) 水陸交通的進步——隨着政治的昇平，開元天寶間水陸交通也作空前的發展。在連絡各大都市的幹線上，沿途都有驛驢出賃，有店肆供商旅食宿，非常便利。通典卷七云：

> 至（開元）十三年，……東至宋汴，西至歧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荆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州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

又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云：

> 是時（天寶五載）海內富實，……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

(註一七三)見杜少陵集詳註卷一三。

驢。

復次，裴耀卿(註一七四)於開元年間，和韋堅(註一七五)於天寶年間對於南北水路交通的改良，雖然着眼於江淮糧食的贍給關中，却無形中把南方大生產地的江淮和北方大消費地的長安緊密的連絡起來，從而促進南北貿易的發展。

(3) 生產事業的發展——由於政治的安定，開元天寶間生產事業也大規模的發展起來。如杜甫憶昔詩云：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皆充實。……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又唐語林卷三云：

開元初，……不六七年間，……物殷俗阜。……財寶山積，不可勝計。四方豐稔，百姓樂業。

又册府元龜卷四九七云：

（開元）八年九月，詔曰，『……今原田彌望，畝澮連屬，繇來榛棘之所，遍爲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畝畜之潤。……』

又唐元結元次山集卷七問進士云：

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校量。

生產發達的結果，市場上商品的供給大增，從而交易遂頻繁起來。

由於上述的三個因素，中國商業便一反過去五百多年衰落的狀況，而於安史亂前開始作空前的發展。據舊唐書卷九四崔融傳，崔融於玄宗卽位的前數年（長安三年，703—4）已說：

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

這種以江淮爲中心的水道貿易，在安史亂後，更向前發展。如唐李肇國史補卷下云：

(註一七四)詳見舊唐書卷四九食貨志，卷九八裴耀卿傳，通典卷一，册府元龜卷四九八。

(註一七五)詳見舊唐書卷五三食貨志，卷一三四韋堅傳，舊唐書卷一〇五本傳。

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江湖語云，『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然則(？)大曆(766—780)貞元(785—805)間，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間，開巷爲圃，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博。……凡大船必爲富商所有。……

復次，當日的國際貿易，在陸路方面則向西北發展。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贊說：

開元盛時，稅西域商胡，以供四鎮。

又唐會要卷八六云：

天寶二年十月，勅，『如聞關已西諸國，興販往來不絕。……』

在海道方面，則以廣州爲中心而繁榮起來。如唐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大日本佛教全書本）說僧鑑眞於天寶九載(750—1)抵廣州，見

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船，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

又國史補卷下亦說：

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船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註一七六)。

這種在安史之亂前後急劇發展的國內外貿易，除給予漢末以來氣息奄奄的各商業都市以新鮮氣象外，更造成中唐以後揚州的高度的繁榮(註一七七)。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九唐揚州之盛云：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註一七八)。

(註一七六)李肇國史補序云，『予自開元(713—742)至長慶(821—5)撰國史補，庶史氏或闕，則補之。』可見書中所記廣州貿易盛況爲玄宗時代或中唐以後的事。

(註一七七)詳見拙著唐宋時代揚州經濟的繁榮與衰落，本所集刊第十本第三分。

(註一七八)按鹽鐵轉運使自安史亂後日形重要，此文記揚州之盛當即指中唐以後而言。洪邁於此文後連引中唐以來杜牧、張祜、王建、徐凝諸家的詩，以說明揚州繁榮的狀況，可以爲證

又舊唐書卷一二四田神功傳云：

> 上元元年(760—1)，……至楊州，大掠百姓商人資產，郡內比屋發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殺者數千人(註一七九)。

由於楊州外國商人之多，我們更可想見當日楊州商業的盛況。

作者在第一章中曾經指出，商業的盛衰和貨幣的進步與否有很密切的關係。安史之亂前後商業既然那麼發達，人們在市場上買賣時便自然而然的感覺仍舊把實物當作貨幣來交易的不便，進而普遍的使用錢幣。因此，貨幣經濟遂取過去五百多年自然經濟的地位而代之。

復次，安史之亂前後自然經濟衰落和貨幣經濟興起的第二種原因是錢幣鑄造額的增加。當日鑄錢數量所以增加，約有兩種因素：

(1) 銅的供給之增加 —— 當日銅的供給所以增加，主因爲銅礦之大規模的開採。在唐代開採的各種礦產，以銅礦爲最多(註一八〇)；其產量則除元和初(806)鐵多於銅(註一八一)外，亦以銅爲大宗(註一八二)。這些銅礦的開採，除官營外，又任由人民經營，其產品則按照時價完全由政府收買，以便鑄造錢幣。如通典卷九說：

> (開元)十一年，制曰，『……所在採銅鉛，官爲市取，勿抑其價，務利於人。』(註一八三)

又册府元龜卷五〇一云：

> 貞元九年(793)正月，諸道鹽鐵使張滂奏，『……臣請自今以後，應有銅山，任百姓開採，一切依時價官爲收市。……』詔曰可。

因此，中唐以後政府多置鑪於銅礦所在地，以便就地取材來鑄錢。唐會要卷八九泉貨云：

(註一七九)新唐書卷一四四田神功傳，舊唐書卷一一〇鄧景山傳略同。

(註一八〇)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云，『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陝、宣、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

(註一八一)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

(註一八二)如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云，『天下歲率銀一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

(註一八三)全唐文卷二三玄宗申嚴銅禁制同。

建中元年(780)九月，戶部韓洄上言，『……今商州（今陝西商縣）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治。請增工鑿山以取銅，洛源故監置十鑪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從之。

四年六月，判度支侍郎趙贊以常賦不足用，乃請採連州白銅，鑄大錢，以一當十，權其重輕。

（元和）三年(808)五月，鹽鐵使李巽上言，『得湖南院申，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井。差官檢覆，實有銅錫。今請郴州舊桂陽監置鑪兩所，採銅鑄錢，每日約二十貫，計一年鑄成七千貫，有益於民。』從之(註一八四)

又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云：

（元和六年）蔚州（今山西靈丘縣）三河冶距飛狐故監二十里而近。河東節度使王鍔置鑪，疏距馬河水鑄錢，工費尤省。以刺史李聽爲使，以五鑪鑄，每鑪月鑄錢三十萬(註一八五)。

當日這樣普遍的開採銅礦，以取得多量的銅來鑄錢，在過去五百多年中是稀有的現象！

(2) 鑄錢技術的進步——關於安史之亂前後鑄錢技術的進步，我們可於下舉二事得到一些消息。頭一件事是安史亂前錢幣鑄造者由不諳鑄錢技術的農民變爲專業的熟練工人。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云：

天寶十一載(752—3)，……是時增調農人鑄錢，既非所習，皆不聊生。內作判官韋倫請厚價募工，繇是役用減而鼓鑄多(註一八六)。

第二件事是安史亂後蔚州飛狐縣的利用水力及機械來鑄錢，結果人工大爲減省。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一四蔚州說：

元和七年(812)，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吉甫奏，『臣訪聞飛狐縣三河冶銅山約數十里，銅礦至多。去飛狐錢坊二十五里。兩處同用距馬河水，以水斛銷

(註一八四)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册府元龜卷五〇一略同。

(註一八五)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唐會要卷八九略同。

(註一八六)舊唐書卷一三八及新唐書卷一四三韋倫傳略同。

銅。北方諸處鑄錢，人工絕省。所以平日三河冶置四十鑪鑄錢；舊跡並存，事堪覆實。……制置一成，久長獲利。』從之。其年六月起工。至十月，置五鑪鑄錢。每歲鑄成一萬八千貫。

又上引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也說，『王鍔置鑪，疏距馬河水鑄錢，工費尤省。』

由於上述的兩種因素，安史之亂前後錢幣的數量便作急劇的增加。在開元二十六年左右，因爲鑄錢額的增加，錢幣多到『京師庫藏皆滿。』(註一八七)至於每年鑄造的數量，則因時而異。在『開元中(713—742)，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歲盈百萬』(註一八八)。及天寶年間(742—756)，『天下鑪九十九。……每鑪歲鑄錢三千三百緡。……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註一八九)。到了安史之亂以後，除各地錢監的產品外，劉晏又把江嶺諸州貢輸長安的土產換取鑄錢原料，以便在江淮一帶鑄造大量的錢幣。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云：

晏以江嶺諸州任土所出皆重麤賤弱之貨，輸京師，不足以供道路之直，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荆揚二州。自是錢日增矣。

再往後，到了會昌五年(845)七月，唐武宗開始毀滅佛法，政府遂乘機把過去幾百年寺院及士庶之家因使用佛像鐘磬而佔有的大量的銅銷鑄爲錢，以增加錢幣的流通量(註一九〇)。唐會要卷四九云：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以天下廢寺銅像及鐘磬等委諸道鑄。』(事具泉貨門)其月，又奏，『天下士庶之家，所有銅像，並限勅到一月內送官。如違此限，並准鹽鐵使舊禁銅條件處分。其土木等像並不禁，所由不得因此擾人。其京城及畿內諸縣衣冠百姓家，有銅像，並望送納京兆府。自拆寺以來，應有銅像等，衣冠百姓家收得，亦限一月內陳首送納。如輒有隱

(註一八七)新唐書卷五八食貨志。

(註一八八)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戶部尚書楊於陵語。

(註一八九)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册府元龜卷五〇一，通典卷九略同。

(註一九〇)這次佛法的毀滅，政府要取佛寺的銅來鑄錢，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動機。你看當日政府只要佛寺的銅像，『其土木等像並不禁』，其眞意所在，至爲明顯。

藏，並准舊條處分。』勅旨宜依。

又同書卷八九泉貨云：

會昌六年二月，勅，『緣諸道鼓鑄佛像鐘磬等新錢，已有次第，……』勅，『……今加鼓鑄，必在流行。……京城及諸道起今年十月以後，公私行用，並取新錢。……』(註一九一)

又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云：

(會昌五年)秋七月庚子，敕併省天下佛寺。……中書又奏，『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鹽鐵使鑄錢。……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勅出後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內依舊。』……從之。

又新唐書卷一六三柳仲郢傳云：

會廢浮屠法，盡壞銅像爲錢。

這樣一來，錢幣的流通額自然更有大量的增加(註一九二)。

錢幣流通量增加後，以錢幣代替穀帛等實物來作種種的用度，始有可能。因此，隨着安史之亂前後錢幣數量的增加，自然經濟便日漸衰落，貨幣經濟則代之而起。

(二)實物貨幣的廢棄與金屬貨幣(錢)使用的發達

由于商業的空前發展，和錢幣的大量增加，中國社會遂于安史之亂的前後，或公元八世紀左右，發生急劇的變動。這種變動的特點爲錢幣勢力的上升，和實物勢力的下降；無論在商品的買賣，租稅的徵收，地租的繳納，或工資的支付上，都表

(註一九一)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略同。

(註一九二)在唐代史籍中，我們又可看見中唐以後有錢幣短少的現象(詳見拙著唐代物價的變動，本所集刊第十本第三分)。不過，這種現象和過去數百年的錢幣稀少現象絕對不同。過去數百年的錢幣稀少，是眞正的稀少。中唐以後的錢幣短少，只是在貨幣經濟發展，人們對錢幣的需要大增的情形下感覺到的錢幣求過於供的現象而已；事實上，錢幣數量是一天比一天增多起來的。復次，我們又不能因以後北宋鑄錢數量之多(詳見宋史卷一八〇食貨志)，而斷言開元或中唐以後鑄錢數量之少。反之，我們却可因此而看出北宋的貨幣經濟要比中唐以後發展得多。

現得非常明顯。換句話說，當日人們漸漸感覺到如過去五百多年那樣使用穀帛等實物來交易，發給工資，及繳納租稅和地租的不便，從而普遍的改用錢幣來作上述種種的用途。茲先就交易方面申述如下。

在安史亂前，即開元年間，人們在市場上買賣時已經感覺到仍舊把粟帛等實物當作貨幣來交易的不便，因爲『布帛不可以尺寸爲交易，菽粟不可以秒勺貿有無』(註一九三)。及安史亂後，人們也多覺得以錢幣作交易媒介遠較實物爲便。下引杜佑的話，當可代表這時候一般人的意見。他說：

> 原夫立錢之意，誠深誠遠。凡萬物不可以無其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其金銀則滯于爲器爲飾。穀帛又苦于荷擔斷裂。唯錢可貿易流注，不住如泉。若穀帛爲市，非獨提挈斷裂之弊，且難乎銖兩分寸之用(註一九四)。

總之，當日人們已經深深感覺到粟帛的用作貨幣，過于笨重，而又不便分割，以致不能適應市場上遠較以前頻繁的交易。因此，在安史之亂的前後，當人們在市場上交易的時候，賣主多向顧客索取錢幣作代價，而拒絕收受布帛等實物。册府元龜卷五〇一云：

> (開元)二十年九月，制曰，『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如聞市肆必須見錢，深非道理！……』(註一九五)
>
> 是月(元和七年五月，812)，兵部尚書判戶部王紹，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鹽鐵使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時用，多重見錢。……』(註一九六)

大家既然爭着使用錢幣，錢幣的流通自然要頻繁起來。因此，財政專家劉晏『自言如見錢流地上』(註一九七)。可見當日市場上錢幣流通的盛況。

可是，當日人們這種排斥實物，專門使用錢幣的行爲，一方面要違反過去五百

(註一九三)通典卷九，册府元龜卷五〇一，唐會要卷八九，開元二十二年三月詔。

(註一九四)通典卷八。按通典上於貞元十七年(801—2)，見舊唐書卷一四七杜佑傳。杜佑這幾句話，當即當日一般人的意見。

(註一九五)册府元龜卷五〇四，通典卷九，唐會要卷八八，全唐文卷二五令錢貨兼用制略同。

(註一九六)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略同。

(註一九七)新唐書卷一四九劉晏傳，國史補卷上。

多年傳統的習慣，他方面又使市場上發生籌碼不足的現象。政府看見這種情形，遂屢次下詔糾正，命人民于買賣時仍舊把實物當作貨幣來交易，最低限度也要錢物兼用。册府元龜卷五〇一云：

（開元）二十年九月，制曰，『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如聞市肆必須見錢，深非道理！自今以後，與錢兼用。違者準法罪之。』

（二十三年）十月，詔，『錢貨兼通，將以利用。而布帛爲本，錢刀是末。賤本貴末，爲弊則深！法教之間，宜有變革。自今已後，所有莊宅以（全唐文作「口」，「以」誤。）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絲、綿等。其餘市買到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註一九八）。

又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云：

（貞元）二十年（804—5），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

又唐會要卷八九云：

（元和）六年（811）二月，制，『公私交易十貫錢以上，卽須兼用疋段。委度支鹽鐵使及京兆尹卽具作分數條流聞奏。』（註一九九）

又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云：

文宗（827—840）……詔方鎮縱錢穀交易。

（太和）四年（830—1），詔，『……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束如京師。』

不過，當日社會經濟既然已經發展到非用錢交易不可的程度，政府這種開倒車的法令，雖有武力作後盾來強制人民服從，也只能收效于一時，不能實行于久遠。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三四錢貨議狀云：

臣不敢遠徵古證，竊見元和以來，……次有交易錢帛兼行之法，……然而……錢帛不兼于賣鬻，……亦未聞鞭一夫，黜一吏，賞一告訐，……（註二〇〇）

（註一九八）唐會要卷八九，全唐文卷三五命錢物兼用勅略同。

（註一九九）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册府元龜卷五〇一，全唐文卷六二賑恤百姓德音略同。

（註二〇〇）全唐文卷六五一同。

又上引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于敍述文宗太和四年詔後，也趕緊跟着說：

未幾皆罷。

原來當日人民對于實物貨幣的排斥，幷不是故意和政府爲難，實完全因爲自利心叫他們不得不這樣做，否則便要吃虧。這可徵引一事來加以說明。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四一論和糴狀云：

況度支比來所支和糴價錢，多是雜色匹段，百姓又須轉賣，然後將納稅錢。至于給付不免侵偸，貨易不免損折，所失過本，其弊可知(註二〇一)。

人民須以錢納稅，而政府向他們糴買穀米却只付布帛作代價，因此他們又須把布帛轉賣得錢，才能納稅。結果，人民便多一種損失。這種損失，在政府法令強迫下，人民只好忍受。可是，如果在自由市場上出賣穀米，我們可以推知，他們一定拒絕收受布帛作代價，必須主顧給錢才願意賣。

關于安史之亂前後錢幣勢力上升的情況，除如上述外，我們又可從錢幣流通地點的擴張來加以考察。資治通鑑卷二四二載長慶元年九月壬子，

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爲，『……大曆(766—780)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註二〇二)

由此可知，山東、河北、山西及嶺南一帶，本來是使用實物貨幣(註二〇三)的，到了大曆年間，卽安史亂後不久，却完全改用錢幣。不特上述各地，在邊疆一帶，錢幣也漸漸流通起來了。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載長慶初年(821)楊於陵的話云：

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通有無，……昔行之于中原，今洩之于邊裔。

這是有事實爲證的。在安史亂前，卽天寶四載，政府曾把馳、絹、練、綿等物運往武威、燉煌一帶出賣，再將出賣所得的錢購買粟、麻、小麥、青麥及豌豆等農產品，以作軍糧之用(註二〇四)。又日本中村不折氏藏西域官文書景片之一，內說天寶六載西北某寺爲家人購買作春衣用的布帛，也以錢幣作代價來支付：

(註二〇一)全唐文卷六六七同。

(註二〇二)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略同。

(註二〇三)嶺南雜用金銀，却有些例外。

(註二〇四)詳見燉煌掇瑣六六天寶四年官中賣出正帛並買進軍糧帳目，因文太冗長，茲從略。

天寶六載四月十四日，給家人春衣歷：常住、大及、夭子、察奴，已上四人，人各給緤一段充衫，八尺充褲。祀奴、未如，已上兩人，人各給一段充衫，祀奴給八尺充褌。可曾，付緤一段充衫。胡尾子，付緤一丈三尺充袴。九段，每段用錢貳百貳買到，用給上件人春衣。謹以爲案。請僧連署。僧無生。僧：僧玄藏。僧法藏。僧澄練（註二〇五）。

到了安史之亂以後，錢幣更是老遠的流通至新疆和闐及庫木吐剌等地。Stein 在和闐 Dandan-Uiliq 發見十八件文書，其中有八件是大曆(766—780)建中(780—4)年間的借錢契（註二〇六）。日人在庫木吐剌發見的物品，也有三張借錢契，其中兩張註明『大曆十六年』（註二〇七）。可見這時候的西域，也漸漸由樓蘭晉簡所表現的物物交換，進而爲錢幣的使用了。

由上述，可知安史之亂前後，各地市場上流通的錢幣一天比一天增加，實物貨幣則一天比一天減少。這種由自然經濟轉向爲貨幣經濟的激劇的變動，是顯而易見的。固然，作者也不抹煞事實：在當日某些窮鄉僻壤的地方，因爲還沒有受到以各大商業都市爲中心而發展起來的貨幣經濟的影響，人們仍舊把各種實物當作貨幣來交易。如唐韓愈韓昌黎集卷四〇論變鹽法事宜狀說：

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于己，無物不取（註二〇八）。

又全唐文卷七一五韋處厚駁張平叔糴鹽法議說：

且據山南一道明之。興元巡管，不用見錢。山谷貧人，隨土交易，布帛既少，食物隨時，市鹽者或一斤麻，或一兩絲，或蠟或漆，或魚或鷄，瑣細叢雜者，皆因所便（註二〇九）。

（註二〇五）原文載金祖同唐西域官文書續輯，說文月刊第一卷第十期。

（註二〇六）M. Aurel Stein, Ancient Khotan, pp. 521—533.

（註二〇七）日本大谷家藏版新西域記下卷唐大曆十六年借錢文書和唐借錢文書斷片等圖版，及附錄一第一一頁。又沙州文錄附錄。按大曆無『十六年』，想是邊地離中央太遠，故年號略有錯誤。

（註二〇八）全唐文卷五五〇同。

（註二〇九）册府元龜卷四九三同，系於長慶二年三月條。

又元氏長慶集卷三四錢貨議狀說：

> 自巴已外，以鹽帛爲交易。黔、巫、溪、峽，大抵用水銀、硃砂、繒、綵、巾、帽以相市（註二一〇）。

又題名唐馮贄撰的雲仙雜記（註二一一）卷四云：

> 開成（836—841）中，物價至微。村落買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絹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一首兼與之。（豐年編。）

不過，中唐以後實物貨幣的使用，事實上只限于上述川、陝間及川、黔、兩湖間的一些交通不便，經濟落後的地方；就大體上說，其勢力已經是江河日下，遠不及錢幣那麼雄厚了。

（三）貨幣租稅的徵收與雇役制度的萌芽

中國中古的租稅制度，到了安史之亂左右，也發生急劇的變動。據第三章所述，中國政府的稅收，自漢末以後，到安史之亂的前夕，大體上均以實物爲主；有時雖亦徵收錢幣，但牠在總稅收中所佔的百分比甚小。這種情形，到了安史之亂左右，隨着錢幣流通量的增加，改變得非常利害。換句話說，從安史之亂以後，政府稅收所得，不再完全是布帛粟米等實物，而改以錢幣爲主了。

當唐太宗卽位的時候，國家財政因受安史之亂的影響，所入不敷所出，政府乃向田畝課徵青苗錢，以彌補不足。册府元龜卷五〇六云：

> 初以嘗賦不給，乃稅人墾田，畝十有五錢。資用窘急，不暇成熟，候苗青卽征之，故謂之青苗錢。
>
> 初肅宗乾元（758—760）已來，屬天下用兵，京司百官俸錢減耗。（代宗）卽帝位（762），推恩庶寮，下議公卿，或以稅畝有苗者，公私咸濟。乃分遣憲官稅天下地青苗錢，以充百司課料。至是（永泰二年五月，766），得錢四百九十萬貫（註二一二）。

這是安史亂後纔有的以錢幣繳納的一種租稅。

（註二一〇）全唐文卷六五一同。

（註二一一）關於此書作者問題，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〇雲仙雜記條。

（註二一二）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略同。

其後，到了德宗建中元年(780—1)，由于楊炎的提議，政府更廢除唐初以來以徵收粟帛等實物爲主的租庸調制度，而改爲以徵收錢幣爲主的兩稅法。唐會要卷八三載建中元年八月，

> （楊）炎遂請作兩稅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倖。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俗有不便者，正之。以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德宗善而行之(註二一三)。

這年政府因兩稅而得的收入遂以錢幣爲大宗；册府元龜卷四八八記其總數如下：

> 是年（建中元年），天下兩稅之戶凡三百八萬五千七十有六，賦入一千三百五萬六千七十貫斛。

資治通鑑卷二二六建中元年條把錢穀數目分列，更爲清楚：

> 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稅錢一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註二一四)。

當日這種以徵收錢幣爲主的兩稅法的創立，對于在過去盛行了五百多年的實物租稅制度是一個很大的革命(註二一五)。這一點，中唐以後許多人都感覺到，所以他們對于兩稅法的批評，多集中于徵收錢幣而不徵收實物的一點上。如陸贄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說：

> 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于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纊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

(註二一三)册府元龜卷四八八，舊唐書卷一一八及新唐書卷一四五楊炎傳，全唐文卷四二一楊炎請行兩稅法奏略同。册府元龜系此事於建中元年二月條，唐會要作『八月』，疑有誤。

(註二一四)把這兩項數目加在一起，和册府元龜總數正相符合。

(註二一五)兩稅法在中國租稅史上是一個很大的改革。牠和以前的稅制比較起來，相異之點甚多。不過因爲作者現在要討論的中心題目是貨幣租稅，不能離題太遠，故只好從略。

舊章；違任土之通方，効算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註二一六)。

又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云：

（貞元）十二年(796—7)，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爲，『……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于農人哉？』

又白氏長慶集卷四六息游惰云：

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于農者何從得之？

又同書卷二贈友詩云：

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胡爲夏秋稅，歲歲輸銅錢？……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傭必算丁口，租必計丁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爲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顛頡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傭法，令如貞觀年！

又李翺李文公集卷九疏改稅法云：

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

復次，安史亂後的食鹽專賣稅，自經劉晏整頓後，政府每年因此而得到的錢幣，數量比從前增加十倍。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說：

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779—780），六百餘萬緡(註二一七)。

其後，到了順宗憲宗間(805—7)，由于李巽管理的得法，政府因鹽稅而得的錢幣，更比劉晏的時候增加許多。舊唐書卷一二三李巽傳云：

順宗卽位，……巽遂專領度支鹽鐵使。榷筦之法，號爲難重。唯大歷中僕射劉晏雅得其術，賦入豐羨。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新唐書作

(註二一六)通鑑卷二三四系此疏於貞元十年(794)五月。

(註二一七)唐會要卷八七，舊唐書卷一二三及新唐書卷一四九劉晏傳，通鑑卷二二六略同。

『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貫（註二一八）。

又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云：

順宗時，……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

由此可知，中唐以後鹽稅收得的錢，只次于兩稅而已。

除上述外，安史之亂以後政府向工商業者課徵的稅，也均以錢幣繳納。如礦產稅，在太和（827—836）中，山東『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官，歲收冶賦百萬』（註二一九）。如酒稅，『太和八年（834—5），……凡天下榷酒，爲錢百五十六萬餘緡』。又如茶稅，貞元九年(793—4)以後，『歲得錢四十萬緡』（註二二〇）。此外如稅商賈（通過稅），除陌法（交易稅）（註二二一），及率貸（或曰借商，卽強迫公債）（註二二二），也完全徵收錢幣。

以上都是安史亂後人民以錢幣代替實物來納稅的情形。復次，在過去幾百年人民須直接向政府提供的徭役，到了安史之亂左右，由于錢幣使用的發達，也可漸漸由人民出錢來免除，再由政府拿錢來另外僱人使用。册府元龜卷四八七說：

（開元）二十三年六月，敕，『……比緣戶口殷衆，色役繁多，每歲分番計勞入任，因納資課，取便公私。兼租脚稅戶，權宜輕率，約錢定數，不得不然。如聞州縣官僚不能處置，凡如此色，邀納見錢。或非時徵納，錢（全唐文作賤，錢誤。）賣布帛，旣輕蠶織，爭務貨泉，農商（全唐文作桑，商誤。）之間，頗亦爲弊。朕每思敦本，將以便人，期于省約，使自通濟。自今已後，凡是資課、稅戶、租脚、營窰、折里等，應納官者，並不須令出見錢，抑遣徵備，任以當土。……』（註二二三）

（註二一八）新唐書卷一四九李巽傳略同。

（註二一九）新唐書卷一七九王涯傳。

（註二二〇）均見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

（註二二一）均見唐會要卷八四雜說。

（註二二二）通典卷一一，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舊唐書卷一三五及新唐書卷一二三下盧杞傳。

（註二二三）全唐文卷三五禁資課稅戶納見錢勅略同。

由此可知，開元年間，人民已漸漸出錢免役，以省却供役的麻煩。例如當日年十八以上的中男及殘疾者，有服『門夫』之役的義務，其職責爲輪流守護沒有正式警兵守衞的州縣城門及倉庫門，每次以十日爲限（『每番一旬』）；『若番上不到，應須徵課者，每番閑月不得過一百七十，忙月不得過二百文』(註二二四)。又如唐六典卷三說人民因免除某些徭役而向政府繳納的錢數云：

> 其防閤、庶僕、白直、士力納課者，每年不過二千五百，執衣(註二二五)不過一千文。

又唐會要卷九一云：

> （天寶）五載三月二十日，勅，『郡縣官人及公廨白直，天下約計一載破十萬丁以上。一丁每月輸錢二百八文。每至月初，當處徵納，……』(註二二六)

這都是安史亂前的情形。及安史亂後，人民出錢免役的事，更爲普遍。如册府元龜卷四八七云：

> （大歷）八年正月，詔，『諸色丁匠如有情願納貲課代役者，每月每人任納錢二千文。……』

又杜牧樊川文集卷一三與汴州從事書云：

> 汴州境內最弊最苦是牽船夫。大寒虐暑，窮人奔走，斃踣不少。某數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縣，見縣令李式甚年少，有吏才，條疏牽夫，甚有道理。云，『……計一年之中，一縣人戶，不著兩度夫役。如有遠戶不能來者，卽任納錢，與於近河雇夫，對面分付價直，不令所由欺隱。一縣之內，稍似蘇息。』(註二二七)

又司空圖司空表聖文集卷七王公（凝）行狀云：

> （宣宗時，847—859）廉問湖外，……先是內外使臣自江陵理棹，則緣境數

(註二二四)通典卷三五。新唐書卷五五食貨志略同。

(註二二五)據通典卷三五，執衣的任務爲供官員『隨身驅使，典執筆硯』。

(註二二六)册府元龜卷五〇六略同。由此推算，白直一年共輸錢 2496 文，與唐六典每年不過二千五百之數相合。

(註二二七)全唐文卷七五一同。

州皆弊控（全唐文作『挽』）舟之役。公舉奏條約。給（全唐文作『結』）官緡以僦水工。自是行役不淹，人遂安逸（註二二八）。

當日這種由差役改爲雇役的變動，實是北宋王荆公免役法或雇役法的先聲。中古以來人民須向政府直接提供的徭役，自安史之亂前後開始漸以錢幣代替後，再經過三百年左右的衍變，到了北宋中葉，遂改爲完全以錢幣免役的雇役制度。

由上述，我們可知中國的賦役制度，到了安史之亂前後，隨着錢幣使用的發達，發生一個激劇的變動。安史之亂以後政府租稅的收入，已不復如過去五百多年那樣以粟帛等實物爲大宗，而改爲以錢幣爲主。至于以前人民須直接向政府提供的徭役，到了這時，也開始漸漸改以錢幣繳納給政府，再由政府拿錢來另外僱人使用。總之，以安史之亂左右開始的賦役制度，由於錢幣勢力的侵入，和以前大不相同，漸漸富有貨幣經濟的色彩。

（四）貨幣地租的萌芽

據第四章所述，中古佃農向地主繳納的地租，完全以粟米等實物爲主。這種實物地租的制度，大約因爲在農村社會裏已經有了根深蒂固的基礎，故安史亂後，當租稅及工資等均已改用錢幣的時候，牠在某些地方還很盛行。如唐會要卷八三說內莊宅使管下的官田的田租以斛計算云：

（大曆）十四年五月，內莊宅使奏，『州府沒入之田，有租萬四千餘斛。……』

又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說京畿田租以石計算云：

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

這些以斛或石計算的田租，當然是指穀粟等農產品來說的。故新唐書卷一五三段秀實傳有代宗時佃農以穀輸租的記事。

不過，當日某些地方雖然仍舊盛行實物地租的辦法，在另外一些地方，因爲受到錢幣勢力的侵入，人們却開始拿錢幣來繳納地租了。這種情形，約始于天寶年間。如日本中村不折氏藏西域出土的租田契景片說以錢四百五十文租到田地一頃二畝云：

（註二二八）全唐文卷八一〇同。

天寶五載閏十月十五日，□□交用錢肆伯伍拾文，於呂才藝邊租取澗東渠口分常田一頃貳畝。東□□，西廢宅，南□□，北抵公廨。其地安用。天寶六載佃食。如到下午之日，□□得田佃者，其錢壹罰裁。……有……田。錢主□□□堂。田主呂才藝，歲五十八。保人妻李□。保人渾定仙。保人□□。清書人渾仙（註二二九）。

這是以錢繳交農地地租的例。又唐鄭還古博異志敬元穎條說陳仲躬在洛陽以錢租賃房屋云：

唐天寶中，有陳仲躬……于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仲躬曰，『某已用錢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註二三〇）

這裏說用來繳納房租的錢幣，固然是租用房屋（改良物）的代價，但房屋所在地的地租當然也暗中包括在內。由此可知，安史亂前市地的地租亦有以錢繳納的。

及安史亂後，人們租用田地，亦有以錢幣代替實物來繳納地租的。新唐書卷一六四崔玄亮傳說：

（元和間，806—821）稍遷密歙二州刺史。歙……民山處，輸租者苦之。下令許計斛輸錢。民賴其利。

按租庸調制中的租粟，自建中元年兩稅法施行後已經廢除，這裏說『計斛輸錢』的租當卽指人民因租用官田而輸的田租而言。又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七二乾符二年南郊赦說：

內莊宅使巡官及人戶等，應欠大中十三年（859—860）以前，至咸通八年（867—8）以前，諸色錢六萬二千三百八十貫三百文，斛一十萬三千七十四石九斗，……念其累歲不稔，人戶貧窮，徒有鞭笞，終難徵納，並宜放免。

按內莊宅使爲經管官有田產的官吏（見上引唐會要卷八三），這裏說人戶因『累歲不稔』而欠內莊宅使的錢物，當卽指租種官田所納的田租而言。可見當日的田租又有錢與實物兼納的。

（註二二九）原文載金祖同唐西域官文書佚存，說文月刊第一卷第八期。金氏於此契後聲明，『右租田契，已經割裂成二紙，疑有脫簡。』

（註二三〇）大平廣記卷二三一陳仲躬條同。

總之，中古以來的實物地租制度，因爲在農村社會裏已經根深蒂固，故安史亂後，在某些地方還很盛行。可是，雖然如此，牠究竟抵抗不住當日貨幣經濟的大潮流。因此，在另外一些地方，由于安史之亂前後錢幣使用的發達，人們便開始以錢幣繳納給地主，作爲地租之用。

（五）貨幣工資的盛行

安史之亂前後錢幣流通的發展，除如上述令到貨幣、租稅、徭役及地租各方面發生變動外，同時又給予工資方面以很大的影響。換句話說，在過去五百多年人們多利用實物來支付的工資，到了安史之亂左右，由於錢幣數量的增加，漸漸改爲以錢支付。茲就官吏的薪俸，自由職業者的收入，和勞動者的工資，分別敍述如下。

據第五章第五節所述，安史亂前官吏的薪俸，分爲祿、職田及俸料錢三項。前二者爲粟米等實物，後者爲錢幣，但常有一部份折成實物來發給。總之，他們的收入以實物爲主，錢幣只佔其中一小部份。這種情形，自安史亂後，有很大的變動。這時因爲錢幣使用的發達，官吏薪俸中的錢幣部份一天比一天增加，至於祿及職田等實物部份則一天比一天減少，或甚至於消滅。

安史亂後中央官吏的俸料錢，除乾元元年（758—9）曾因財政困難而一度停給(註二三一)外，到了大曆十二年(777—8)楊度常衰爲相，普遍的予以增加。新唐書卷五五食貨志云：

> 楊度常衰爲相，增京官、正員官及諸道觀察使、都團訓使、副使以下料錢。初檢校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月給錢十二萬；至是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請同正官，從高而給之。文官一千八百五十員，武官九百四十二員，月俸二十六萬緡，而增給者居三之一。

又唐會要卷九一云：

> 大曆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度支奏，『加給京百司文武員及京兆府縣官每月料錢等，具件如後。……』度支奏，『歲約加一十五萬六千貫文，准舊給都當二十六萬貫文以來，伏望准數，起六月一日給付。』勅旨依，仍令所司起

(註二三一)唐會要卷九一內外官料錢上乾元元年條。

五月一日支給(註二三二)。

其後，到了貞元四年（788—9），由於宰相李泌的提議，中央官吏的俸料錢又復增加。册府元龜卷五〇六云：

（貞元）三年十一月，勑，『京官宜加給料錢。』……是年李泌作相，……奏請加百官俸料，各據品秩，以定月俸。……帝皆許之。

四年正月，中書門下奏，『京文武及京兆府縣官總三千七十七員。據元給及新加，每月當錢五萬一千四百四貫六百十千文，一年都當六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五貫四百四文。……右中書門下准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勑，「京官宜加料錢」，准勑商量。謹件如前。』勑旨依(註二三三)。

現把這兩次增俸後中央官吏每年俸料錢的總額和安史亂前的總額列表如下：

年代	俸料錢（單位文）
乾封元年(666—7)	153,720,000
大曆十二年(772—3)	260,000,000
貞元四年(788—9)	616,855,404

據上表，可知中央官吏俸料錢的總額，自貞元四年起約較安史亂前增加四倍多點。這個增加後的數目，固然一部份由於官吏人數的增加，但當日各人俸料錢均已增加不少，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除中央官吏外，安史亂後地方官吏的俸料錢增加得更利害，其數量遠較中央官吏爲多，以致許多人都爭着去充任地方官吏。唐會要卷九一云：

其年（元和六年），中書門下奏，『……艱難以來，網禁漸弛，於是增置使額，厚請俸錢。故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者。列郡刺史無大小，給皆千貫。……』(註二三四)

又新唐書卷一三九李泌傳云：

是時（貞元初年）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

(註二三二)册府元龜卷五〇六略同。

(註二三三)唐會要卷九一略同。

(註二三四)通鑑卷二三八，册府元龜卷五〇七，新唐書卷一四六李吉甫傳略同。

鎭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荐爲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

又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註二三五)一文中，亦引用元微之白居易文集中與俸料錢有關的詩句，證明肅代以後外官的俸料錢遠較京官爲多。

安史亂後官吏俸料錢增加的情形，已如上述。復次，他們眞正領到的俸料錢，自元和年間起，也漸漸完全改爲錢幣，不再像以前那樣折成實物。唐會要卷九一云：

（元和）十二年（817）四月，勅，『京百官俸料，從五月以後，宜並給見錢。其數內一半充（册府元龜作「先」，「充」誤。）給元估疋段者，卽據時估實數，迴給見錢』(註二三六)。

又同書卷九二云：

（太和）九年（835）六月，勅，『宰相俸料，宜依元和十四年以前舊例，並給見錢』(註二三七)。

又册府元龜卷五〇八云：

（會昌）六年（846）二月，詔，『以諸道鑄錢已有次第，須令舊錢流布，絹價稍增，文武百寮俸料起三月一日並給見錢；其一半先給虛估匹段，對估時價支給。』(註二三七)

三月，戶部奏百官俸料一半匹段給見錢則例。勅旨，『其一半先給元估匹段者，宜令戶部准元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勅例，每貫給見錢四百文，使起四月以後支給。』

當日官吏薪俸中錢幣部份的增加，已如前述。在另一方面，他們薪俸中的實物部份，卻一天比一天的減少。他們在安史亂前領得的祿米，『自至德(756—8)之後

(註二三五)原文載清華學報第十卷第四期。

(註二三六)册府元龜卷五〇七略同。

(註二三七)册府元龜卷五〇七同。

(註二三八)唐會要卷八九，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略同。

不給』(註二三九)。至於他們因職田而得的田租，自安史亂後，也減少許多。唐會要卷九二云：

> 廣德二年(764)十月，宰臣等奏，『減百司職田租之半，以助軍糧。』從之。
>
> 大曆二年正月，詔，『京兆府及畿縣官職田，宜令準外州府縣官例，三分取一分。』至十月，減京官職田，一分充軍糧，二分給本官(註二四〇)。

又通典卷三五註云：

> 自大曆以來，……減外官職田三分之一，……

因此，到了元和年間，白居易甚至有職田制度廢弛之嘆。白氏長慶集卷三〇進士策問第四道(元和三年)說：

> 百官職田，蓋古之稍食也。國朝之制，懸在有司。兵興已還，吏鮮克舉。今稽其地籍，則田亦具存。計以戶租，則數多散失。

又同書卷四七議百官職田亦說：

> 臣伏以職田者，……亦古者公田稍食之制也。國家自多事已來，厥制不舉。故稽其地籍，而田則具存。考以戶租，而數多散失。

可見職田田租在當日官吏的薪俸中已經退居不足重輕的地位。

除官吏外，自由職業者的收入，也於安史之亂前後漸漸改以錢幣爲主，不再像以前那樣完全收受布帛等實物。茲分述如下：

(1) 抄寫者——巴黎國立圖書館藏敦煌寫本第二三八〇號是一道教經典款識，內說玄宗出錢僱人抄寫道教經典云：

> 大唐開元廿七年二月一日，開元聖文神武皇帝上爲宗廟，下爲蒼生，內出錢七千貫敬寫。道士馮楚瓘初校。道士常乘雲再校。道士何思遠三校。(下缺)(註二四一)

這是安史亂前的情形。安史亂後。他們的工資更是常以錢幣支付。如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五說洛陽乞兒爲人寫經以贖錢云：

(註二三九)通典卷三五註，册府元龜卷五〇五。

(註二四〇)册府元龜卷五〇六同。

(註二四一)見石濱純太郎伯希和蒐集燉煌遺書中的三篇，服部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文集。

大歷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再三擲筆高尺餘，未曾失落。書跡官楷，手書不如也。

又太平廣記卷三〇四喬龜年引瀟湘錄說喬龜年爲人書寫篆字，得錢養母云：

喬龜年，善篆書，養母甚孝。大歷中，每爲人書大篆字，得錢卽供甘旨。

又同書卷一〇六宋衍引報應記說宋衍爲米綱充當文書，每月得錢八千文云：

宋衍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年餘，有爲米綱過三門者，因不識字，請衍通管簿書，月給錢八千文。

(2) 畫家——如太平廣記卷二一三楊炎引唐畫斷說楊炎未達時爲人繪畫，得錢甚多云：

楊炎唐貞元中宰相，氣標王韓，文敵揚馬，畫松石山水，出于人表。初稱處士，謁盧黃門，館之甚厚。知有丹青之能，意欲求之，未敢發言。楊懇辭去。復苦留之。知其家累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安，乃潛令人將數百千至洛供給，取其家書迴以示楊公。公感之，未知所報。盧因從容，乃言欲一蹤，以子孫寶之。意尙難之。遂月餘圖一障，松石雲物，移動造化，世莫覩之。其跡妙上上品。

(3) 醫生——如酉陽雜俎續集卷二說馬醫因給人家的馬治病而得錢云：

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馬醫，稱馬患脚，以二十鎰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馬醫所獲錢，……

又國史補卷中說王彥伯爲一般人治病，得錢帛甚多云：

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時列三四竈，煮藥于庭。老少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皆飲之而去。翌日，各負錢帛來酬，無不效者(註二四二)。

又酉陽雜俎卷一說王布爲女聘醫治疾，費錢甚多云：

永貞年(805—6)，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鏹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

(註二四二)此事不記年月。按王彥伯曾爲裴胄尙書之子治病(見酉陽雜俎卷七)，而裴胄之爲尙書，事在貞元十九年(見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貞元十九年五月辛亥條)。可知上述王彥伯爲人治病得錢帛事，約發生於貞元年間。

五，豔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

又唐高彥休唐闕史卷下王居士神丹說王居士爲人治病，得錢三百緡云：

有長樂王居士者，耄年鶴髮，精彩不衰，嘗持珠念佛，施藥里巷。家屬十餘口，豐儉適其中。一日，遊于終南山之靈應臺。臺有觀音殿基，詢其僧，則曰，『梁棟欒櫨，悉已具矣。屬山路險峻，輦負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緡不可集事。』居士許諾，期旬日，齎錢而至。至京，乃托于人曰，『有富室危病，醫藥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成終南山佛屋，足矣。』果有延壽坊鬻金銀珠玉者，女歲十餘，遘病甚危，衆醫聚藥，手不能措，願以其價療之。居士則設盟于牋，期于必效。且曰，『滯工役已久矣。今留神丹，不足多慮。某先持此錢，付所主僧，冀獲雙濟。』鬻金者亦奉釋教，因許之。留丹于小壺中，齎緡而往。……涉旬……女……須臾忽蘇，黎明則胎息續矣。一家驚異，媿謝王生。生乃更留藥而去(註三四三)。

(4) 卜者——如太平廣記卷二一七王栖嚴引渚宮舊事說某老人以百錢求卜云：

王栖嚴自湘川寓江陵鷺白湖，善治易，窮律候陰陽之術。……每清旦布蓍，爲人決事，取資足一日爲生，則閉齋治園。大歷中，嘗有老父持百錢求筮。卦成，……

(5) 堪輿家——如太平廣記卷二八九周士龍引辯疑志說周龍爲人選擇墳地，得錢甚多云：

周士龍，婺州東陽人，能辨山罔，卜擇墳墓之地，與叔父齊名。每至歲月，大通門庭，車馬如市。人之夭壽官位，吉凶利害，一切以利斷。大歷五年，至鄴中。……有兵馬使婁瓘，舉大事，遂懇祈士龍卜地，前後餉千餘貫。士龍大喜，遂與月餘日尋訪山原，忽得一處，說其地勢迴抱，是龍腹，三年內必得節度使。瓘亦以自負。……

(註二四三)太平廣記卷八四王居士略同。按唐闕史序云，『大中(847—860)咸通(860—864)而下，或有可以爲誇尙者，資談笑者，垂訓戒者，惜乎不書於方册，輒從而記之。……中和歲(881—5)……出所記述……』可如此事當發生於大中咸通年間以後，中和年間以前。

由上述，可知從安史之亂前後開始的官吏和自由職業者的工資，多以錢幣支付。此外，當日勞動者的工資也多以錢幣發給。如太平廣記卷四八七蔣防霍小玉傳說玉工的工資以錢支付云：

> 大曆中，……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侯）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酧我萬錢。……

又同書卷八四奚樂山引集異記說車工的工資，按件計算，以錢支付云：

> 上都通化門長店，多是車工之所居也。廣備其財，募人集車輪轅輻，皆有定價。每治片輞，通鑿三竅，懸錢百文。雖敏手健力，器用利銳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樂山者，攜持斧鑿，詣門自售，視操度繩墨頗精。徐謂主人，『幸分別輞材，某當併力。』主人訝其貪工，笑指一室曰，『此有六百片，甘任意施爲。』樂山曰，『或欲通宵，請具燈燭。』主人謂其連夜，當倍常功，固不能多辦矣。樂山乃閉戶屏人，丁丁不輟。及曉，啓主人曰，『並已畢矣。願受六十緡而去也。』主人泊鄰里大奇之。則視所爲，精妙錙銖無失。衆共驚駭。卽付其錢。樂山謝辭而去（註二四四）。

又册府元龜卷四九一說山陵建築工匠的工資以錢發給云：

> （元和十五年）四月，勅，『……京畿百姓聞甚艱貧。……今又修營陵寢，雖應緣驅役，皆給價錢。』

又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亦云：

> （元和十五年七月）丁卯，以門下侍郎平章事令狐楚爲宣州刺史，……楚爲山陵使，縱吏于暈刻下，不給工徒價錢，積留錢十五萬貫爲羨餘以獻，故及於貶（註二四五）。

（註二四四）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二云，『集異記一卷，唐薛用弱撰。案唐書藝文志載用弱字中勝，長慶光州刺史。……三水小牘載其大和中自儀郎曹出守弋陽，爲政嚴而不殘。』此書作者既爲長慶(821—5)大和(827—8)間人，則書中所記之事，雖未註明年月，亦必發生於此時期左右，可無疑義。

（註二四五）舊唐書卷一七二令狐楚傳略同。

又上引唐闕史卷下說王居士行醫所得的三百緡，也是用來支付觀音殿建築匠的工資的。復次，酉陽雜俎續集卷三亦說某女工因造雨衣而得錢甚多云：

> 荆州百姓郝惟諒，……會昌二年寒食日，與其徒遊於郊外，……迨宵分，……覩一婦人，姿容慘悴，服裝羸弊，方向燈紉縫。……婦人云，『某……不廢女工，自安此造雨衣，與胡衣家傭作，凡數歲矣。所聚十三萬，……』郝……遲明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卽與偕往……視之，散錢……緡之數如言。

以上說以錢支付的工資，偏于技術工人方面。此外，當日一般沒有技術的工人的工資，也多以錢發給。如太平廣記卷三三六字文覬引廣異記說韓徹以錢五千文僱工人往墳墓中取物云：

> 韓徹者，以乾元中任隴州吳山令，……乃命縣人掘之，深數尺，得一塚。塚中……遙望西北隅有一物，衆謂是怪異，乃以五千顧工人取之。初縋，然晝燭一束，工人背刀緣索往。

又唐聖朝長讀宜室志卷二說趙某爲人寄信，得錢萬文云：

> 陳少遊鎮淮南(註二四六)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至華陰縣，……金天王……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都，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因以錢一萬遺之。趙卽以錢貯懷中……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

又酉陽雜俎卷一四說王清被人僱用，賺得錢幣云：

>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環。

又唐李復言續幽怪錄卷一麒麟客說張茂實以每月五百文的工資率僱用僕人云：

> (張)茂實家于華山下，大中(廣記作『唐大中初』)偶遊洛中，假僕於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叟，年可四十餘。傭作之直月五百(註二四七)。

由上所述，可知中國的工資制度，到了安史之亂前後，由於錢幣的普遍使用，發生很大的變動。在官吏薪俸方面，俸料錢的數量一天比一天加增，而支付時也多

(註二四六)陳少遊於大曆建中間鎮淮南，見舊唐書卷一二六本傳。

(註二四七)太平廣記卷五三麒麟客略同。

全改爲錢幣，不再像以前那樣折成實物來發給。至於他們薪俸中的祿米，自安史亂時起卽已全部取消，而從職田中得到的實物地租亦一天一天的減少。總之，安史亂後公務員的薪俸有由實物轉變爲錢幣的傾向。此外，當日自由職業者及勞動者因服務而得的工資，也不再像過去幾百年那樣以實物爲主，而多改爲錢幣。

（六）總結

總括本章所述，我們可知中國自漢末以後盛行了五百多年的自然經濟，到了安史之亂前後，一方面由於商業的空前發展，他方面由於錢幣的大量增加，勢力日漸衰落，貨幣經濟則代之而起。從此以後，金屬貨幣（錢）代替了以前的實物貨幣，貨幣租稅代替了實物租稅，貨幣工資代替了實物工資；此外地租方面也漸漸由農產品改爲錢幣，徭役方面也漸漸由差役制改爲雇役制。總之，由于當日貨幣經濟大潮流的冲蕩，錢幣遂普遍而深刻的侵入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當日錢幣這種浩浩蕩蕩的聲勢，如果和過去五百多年錢幣流通稀少，無論交易、租稅、地租或工資方面均須求助于穀帛等實物的情形比較一下，簡直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怪不得當日理財家劉晏心目中的社會是一個『錢流地上』的社會了。因此，歸納當日各方面的變動，我們可以確切的斷定：安史之亂左右是中國經濟史上由自然經濟轉變爲貨幣經濟的一大關鍵。

自然，這種從安史之亂前後開始而以錢幣爲中心的貨幣經濟，只是初步發展的貨幣經濟。牠的更向上的發展，還有待于唐末宋元以後銀幣之普遍而大量的爲各階層人民所使用。不過這點已經超出本文討論範圍之外，故暫時從略。

第七章　結論

總括上文，我們可知在漢代已經漸具規模的貨幣經濟，自漢末以後，間接由于連年戰亂頻仍的影響，直接由于商業的衰落及錢幣數量的減少，勢力一天比一天衰落，自然經濟則起而佔支配地位。從此以後，直到安史之亂左右，約共五百多年的期間，就大體上說，實是自然經濟佔優勢的時代。這時因爲錢幣流通的稀少，在買賣方面，人們多實行物物交換，卽把穀帛等實物當作貨幣來購買其他物品，而賣主也願意收受這些實物作爲出賣物品的代價。在租稅方面，人民能夠拿來繳納的只是

布帛及農產品等物，政府也只好以徵收這些實物爲滿足，故國庫內完全充滿了穀、粟、絹、布等物。政府的收入既然以布帛及農產品爲主，牠向各級公務員發給的薪俸，自然也只好以這些物品爲主。同時，由于錢幣的缺乏，自由職業者及勞動者因工作而從僱主那裏領到的工資，也多半爲穀帛等物；反正這些東西既可供自己直接消費，又可拿來購買其他物品，故他們也願意接受。此外，佃農因借耕田地而繳納給地主的地租，自然更只好限于土地上出產的物品了。總之，在這五百多年的期間，雖然錢幣有時也常被人使用，一般人的經濟生活在任何方面都要和穀帛等實物發生密切的關係。因此，這時期雖然不是純粹的自然經濟時代，至少也是自然經濟佔優勢的時代。

上述漢末以後盛行了五百多年的自然經濟，到了安史之亂前後，一方面由于商業的發展，他方面由于錢幣數量的增加，可要漸漸衰微，而讓位于貨幣經濟了。這時商業既然有空前的發展，人們在市場上買賣時，便深深感覺到仍舊和過去幾百年那樣把笨重和不便分割的穀帛當作貨幣來交易的不便，從而大家都願意改用錢幣來作交易的媒介。同時，當日錢幣數量的激劇增加，又給予人們這種用錢幣代替穀帛來交易的企圖以很大的便利。因此，錢幣遂漸漸搶奪了穀帛等實物過去在市場上具有的貨幣的機能，而大量的流通起來。而且，這種以錢代替實物來使用的方便，不獨人們在市場上買賣時有這種感覺，就是政府和人民間關於租稅的徵繳，僱主和工人間關于工資的授受，也同樣的感覺到錢幣遠較實物爲便；結果，貨幣租稅遂代替了從前的實物租稅，貨幣工資遂代替了從前的實物工資。此外，因爲同樣的理由，佃農當作地租來繳納給地主的農產品，漸漸改用錢幣來代替；人民親自向政府提供的徭役，也漸漸繳納錢幣來免除。總之，當日貨幣經濟的大潮流飄蕩所及，舊社會保存下來的自然經濟遂無情的被牠冲倒。所以，從安史之亂前後開始，各地的市場上充滿了錢幣；政府的國庫裏充滿了錢幣；地主的腰包裏充滿了錢幣；公務員，自由職業者及勞動者，當領到工資的時候，口袋裏也充滿了錢幣。這時錢幣使用之多，多到劉晏『自言如見錢流地上』！當日錢幣既然無論在那方面都和人民經濟生活發生密切的關係，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自然要普遍而深刻的感受到牠的影響。這和過去幾百年錢幣勢力微弱到連交易也可以完全不用牠作媒介的情形比較起來，可以

說是兩種完全相反的對照！因此，安史之亂左右實在是自然經濟和貨幣經濟勢力盛衰消長的一大關鍵。

由此可知，漢末以後，中唐以前，一共五百多年的中古時期，實是一個自然經濟佔優勢的時代；牠有別于此時期以前（漢代）貨幣經濟的相當發展，更有別于此時期以後貨幣經濟的興起。作者這種根據 B, Hildebrand 經濟史分期說來把漢末以後中唐以前的中古時期看作自成一個階段的嘗試，或許不至于有多大的錯誤，因爲這五百多年的中國社會的確是和以前及以後都大不相同的。因此，其他學者從另一觀點出發來探討這時期的社會，也發現牠有別于以前及以後的社會。例如吾師陶希聖先生在南北朝經濟史序中說：

> 在四年以前，一般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史的人們，總把秦漢到滿清劃成一個段落。當時，我也是這樣的一人。四年以來，我對秦漢以後次第的加以研讀，漸漸看出東漢以後，中唐以前，無論在經濟、社會、政治、思想上都自成一個段落，與以前的秦漢及以後的宋明，各有不同之點。最重要的特徵，是大族與教會的經濟特權及政治特權。秦漢不是沒有大族，但政治上受政府的抑制。宋明不是沒有教會，但法律上沒有特權。如再進一步，看取大族與寺院的下面的社會的經濟的組織，更可見與前代後代不同的特質。在大族及僧侶之下，庇護着多數的自由人，領有着多數的部曲僮客，持有着多數的奴隸。反之，在秦漢，我們看見最引人注意的是家內奴隸；在宋明，我們看見的是自由勞動的發達，庇護特權的淪沒。所以，魏晉至隋唐，社會上嚴于士庶之分辨，政治上顯有大族的操持，思想上富于佛教的影響。彼此因應，斷非偶然。

根據陶先生研究的結果，再加上作者斷言自然經濟在這時期佔優勢的結論，漢末以後中唐以前的中古社會不是更明顯的可以自成一個段落，有別于這時期以前及以後的社會嗎？

中華民國卅年十一月廿四日，西川南溪李莊板栗坳。